

#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等领导同志 就史志工作作出批示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的通报》，我市6项成果获表彰，占全省市县优秀成果奖的十分之一。郭树清省长高度重视地方史志工作，去年以来先后8次对全省史志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14年7月1日，《沂蒙革命根据地志》正式出版。人民网作为“山东要闻”对志书出版作了报道。9月29日，郭树清省长批示：“全省各地都应参考借鉴临沂、烟台的经验，搞好红色文化的普查和整理工作。”12月28日，郭树清省长再次批示：“临沂的做法应推广到其他市县。抗战以后，山东境内有多片根据地，每个地方都有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宣传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可以形成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请各地党委、政府、党校、党史、史志、文化、旅游、教育等部门重视起来，组织行动起来。”就我市史志工作做出的出色成绩，市领导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做出批示，对我市史志工作，提出希望和要求。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术平批示：**我市史志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志鉴库馆开发利用并举，网刊学研全面发展，编修了一批精品佳作，各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望再接再厉，创新工作，再创佳绩。尤其要发挥临沂独特优势，着力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沂蒙精神内涵，为建设大美新临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李刚批示：**郭树清省长高度重视地方史志工作，特别是对临沂史志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表扬，充分体现了省领导同志对临沂老区的关心。市史志办的同志要认真学习省领导同志批示精神，继续发扬求真务实，争创一流的工作作风，把修志工作做得更好。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林国华批示：**近年来，史志办工作战绩显著，富有成效，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希望继续发挥好史志工作修志育人、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大力弘扬传承沂蒙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建设经济文化强市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副市长赵爱华批示：**近年来，我市史志工作成果多项获奖，史志办工作成绩走在全省前列。郭树清省长有关批示中要求，全省各地要参考、借鉴临沂经验，峰海书记、术平市长对我市史志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李刚部长、国华部长也分别做了重要批示。几位领导的批示精神，一是体现了对全市史志工作和史志人的关心、重视和尊重；二是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三是对史志工作寄予厚望。希望全市史志人要按照几位领导的要求，继续保持勇争一流的精神状态，发扬成绩，创新工作，克服困难，为弘扬沂蒙精神，传承沂蒙文化再创新辉煌！



2015 · 11, 6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刘振本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刘振本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高来臣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 目 录

## 【本期特载】

忆罗荣桓元帅（下） 白 刃 04

## 【峥嵘岁月】

赖传珠日记（摘录）（下） 10

血染沂蒙的“外国八路”  
——汉斯·希伯牺牲真相 靖一民 12

扼守岱崮 刘兴立 17

沭河上的一场保卫战 王宗富 21

## 【名人素描】

“蒋家天下丁家党”  
——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丁玉隽 23

东吴大将军诸葛瑾 老 秦 27

## 【文化掇英】

傲岸不羁的李方膺 凤 凰 30

## 【蒙山沂水】

蒙山道教初探 赵 苒 33

## 【史海撷萃】

黄石山惨案（上） 陈永杰 37

## 【探索发现】

“大青山突围”之谜（下） 大荒堂主 41

抗战文物之一——  
《国民党的特务政策》 高 昂 44

## 【史料辑存】

- 王小古年谱(续) 刘瑞轩 45  
兰陵古桥探踪 虎骑士 50

## 【诗画赏析】

- 抗战歌曲选——《反法西斯进行曲》 本 编 54  
沂水八景题咏汇编(上) 党宝修 56

## 【影像沂蒙】

- 沂蒙革命根据地略影——巾帼铁流(六)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61

## 【百家渊流】

- 姓氏百家漫谈——徐姓(下) 赵丹峰 64

## 【沂蒙名医】

- 国粹之星  
——访张志发 刘凤才 70

## 【沂蒙乡亲】

- 从“老茂”到“茂导”  
——记朱时茂 本 编 78

## 【史志动态】

封面：《国民党的特务政策》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抗战文物之——国民党的特务政策》)

封底：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略；亦可谓忠矣。”——《大戴礼记》/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 忆罗荣桓元帅 (下)

白刃



1939年秋天，微山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中共湖西区党委几位部长及大批革命干部被杀害。事件挑起者是暗害分子王须仁，区党委书记亦负有重大责任，而罪魁祸首却是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闻知，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带着特务连飞驰到湖西，挽救了尚被关押的几百干部，调四大队到鲁南郟马一带，将王凤鸣撤职，调回师政治部处理，并电告中央。后来中央接到被害者家属的控告信，决定开除王凤鸣党籍，判处有期徒刑。文件于1941年2月发出，辗转到山东已是夏天。当时师部正在滨海区蛟龙湾召开全师政工会议，罗荣桓看到文件，和师部几个领导研究后，打电报叫王凤鸣来师部。王凤鸣经过批评教育，分配到教导大队工作，此时任六团团团长。那天上午，罗荣桓正在大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我当时任会议记录，看见王凤鸣骑马来到会场，肖华立即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当天下午，罗荣

桓亲自和王凤鸣谈话，告诉他中央的决定，要他好好改造，日后前途还是光明的。王凤鸣口是心非，当面说服从组织决定，半夜里偷偷起来，穿着裤衩骑马仓惶逃跑，跑到赣榆县投敌，改名杨步云，当了汉奸汪精卫的和平军旅长（一说伪别动队队长）。

王凤鸣的叛逃，出乎大家的意料，引起了震惊。第二天，罗荣桓当众检讨自己对他“姑息”。罗荣桓说，“肃托”问题复杂，类似当年苏区反“AB团”。王凤鸣政治上幼稚，却以马列主义者自居，骄傲自大，目无组织，被坏人利用。念他从小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年纪还轻，觉得经过改造还可以用，想不到会叛变投敌，这是对他姑息造成的恶果。罗荣桓以陈（光）罗名义电告中央，并作检讨：“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

王凤鸣熟悉我军内情，懂得我军打仗的一套办法，他在苏北新浦当汉奸，靠近我六团防区，六团有些怕吃苦的动摇分子，被他瓦解过去。他还配合日军蚕食海陵地区，安了几个伪据点。师政治部协理员罗保成，犯了错误怕斗争，投奔王凤鸣当了伪大队长。

海陵在陇海路北，是我滨海根据地的南疆。罗荣桓和陈光早想铲除这心腹之患。1942年11月初旬，陈光亲临前线，指挥教二旅各团，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连克十余伪据点，活捉了叛徒罗保成。

罗保成原是个俘虏兵，在红军中受过教育，旧军队的习气不改，打仗时“发洋财”，平时吃吃喝喝，问他钱从哪儿来，总说是红军时分的伙食尾巴剩下的五块大洋。五块钱老是用不完，因此有“老五块”的混号。此人年过30，身体瘦长，佝偻腰，驴马面，老鼠眼。叛逃前夜里鸡奸小勤务员，小勤务员喊叫，闹出丑闻，党支部要开斗争会，他夜里悄悄地跑去投敌。

公审罗保成的大会上，他被押上台，双腿打颤，小眼低垂，佝偻腰弯成虾米。罗荣桓政委讲话，愤怒地指着罗保成，喊出第一句话：“狗！一条疯狗！”公审完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我以《狗》为题，写了篇报告文学，登在《战士报》上，那逊同志刻了个狗头作为题图。

1942年1月春节前，临沂敌伪军“扫荡”沭河边，烧杀抢粮，奸淫妇女，醋庄一带火光冲天。陈光代师长正在滨海区，对敌人的暴行非常愤怒，调动教二旅的六团、四团和地方武装，连夜奔袭郯城，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和数百名伪军，活捉日本教官，解放郯城。乘胜攻克马头重镇和17个据点，缴获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创下敌后攻城的典型战例。我在前方访问了陈光师长，他把发起郯城战役的动机、作战过程和指战员英勇杀敌，谈了大半宿。我写了一篇《陈光将军访问记》，带回师部交罗政委审阅。

郯城战役前，罗荣桓正在山东分局开会，陈光没有和他商量，也没有跟肖华等军委会同志研究。罗荣桓看完了访问记，叫我到他那里，说道：“仗已经打了，胜利很大，部队很勇敢，战术上是成功的，应该好好宣传。”说到这里，他沉吟了一阵，皱了皱眉头：“目前山东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中央指示要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战略上没有变，打这样的攻坚战还不是时机，部队的伤亡很大，兵员不好补充，占了城市也守不住，过分刺激了敌人，必然引起鬼子的报复！”

罗荣桓高瞻远瞩，估计被证实了。郯城只占了三天，敌人调动兵力反攻，收复的县城和伪据点又被敌占领。跟着，敌人对滨海区进行冬季大“扫荡”，根据地受了一些损失。

1943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山东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成立新山东军区。原山东军区、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并。陈光同志调延安学习，不久朱瑞同志也去延安。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

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此时罗荣桓身患重病，肾里长了瘤子，经常尿血。他曾致电中央，要求休养半年。毛泽东、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后来他到华中新四军治病，没有治好，很快回山东，行军作战时躺在担架上指挥。

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工作很快展开。农村减租减息，清算恶霸地主的罪行，群众发动起来，青年踊跃参加子弟兵，部队壮大了，攻克根据地周围许多日伪据点。解放区扩大了，沂蒙、鲁南和滨海区连成一片。《战士报》原来发行的对象，主要是师直属队和教二旅三个团。新山东军区成立后，要面对全山东的部队，显得鞭长莫及。罗荣桓决定将《战士报》移交滨海军区，并改名《民兵报》。“民兵”二字报名，请罗政委题字。有人说滨海部队都是主力军，叫“民兵”不大合适。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军和地方武装，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叫‘民兵’还是恰当。”新山东军区政治部出版《战士月刊》，发表总结性指导性的文章，我奉命留下编辑这个月刊。

机关合并，人员整编，许多同志下战斗部队工作。我想当年回国，原想扛枪打鬼子，到前方五六年，只是拿笔杆子观战，没尝过打仗的滋味，未免有点冤枉，日后如何向南洋的朋友交代？这种心情不便曝光，想下连队却是真实感情，于是我向罗政委和肖主任写报告，请求下连队锻炼，得到批准。组织部在介绍信上写下我的志愿。

我背着背包到滨北十三团二连当指导员。连长张洪生、副连长唐林根、营长江拥辉、教导员黄玉昆，都是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的战斗精神和工作作风，是我学习的榜样。二连的班排长和许多战士，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下连队不久，一营奉命到诸城、胶县敌占区，打通和胶东的交通线，在那里和日本鬼子、汉奸李永平部，进行了六次战斗，攻下大洼，拔掉插旗崖据点，我尝到带兵打仗的滋味，得到很大锻炼。当时根本想不到日后要当作家，但这些亲身体验的战斗，对我后来写战争大有帮助。

1944年夏天，我被调回滨海军区主编《民兵报》，几个月后，又被调回山东军区政治部，在《山东画报》社工作。这期间，罗荣桓肩负重任，长期生病，工作上没有联系，很少见面，可是在山东的日子，我亲眼看到几件事，很能代表他的性格，应该补叙一下：

1940年5月，4000日伪军分七路进攻抱犊崮山区，我军主力转移到外围，师部和特务营，留下与敌人周旋。罗荣桓把政治部干部，分散到地方上发动群众、当侦察员。他带着少数干部和警卫连，跟鬼子打游击。有天下午听到枪炮声，罗荣桓同几个警卫员上山，赖可可和我跟着去。我们躲在大石头后面，看见一大队日伪军，从山沟里朝山上打枪开炮。炮弹在附近开花，子弹在身旁噗噗响，我有点惊慌，可看到罗政委举着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监视敌人，也就不害怕了。

同年，朱总司令号召部队剃光头，为了讲卫生，也避免头部负伤治疗困难。但是，号召不等于命令，要自觉执行。我们当时都留着“洋头”，谁也不愿当“和尚”。有天下午游戏时间，罗荣桓来到操场上，背后警卫员拿着一把椅子，大家以为他来看打球，不料他坐下，来了个理发员，把他的长发剃光。这种以身作则、无声的教育，是我军的优良作风。大家不好意思再留长发，第二天纷纷找理发员剃掉。

罗荣桓外表很严肃，初见令人生畏，时间长了谁也不害怕。他从不骂人训人，不发脾气，有问题都愿找他谈。不过他也是个人，也有喜怒哀乐，只是不大外露罢了。我曾见他两次发火，都是在五月反“扫荡”时候。罗荣桓有一对儿女，男孩子在东进山东路上生的，取名罗东进，女孩子在南下郯马时养的，叫罗南下。南下是几个月的婴儿，行军时由一位挑夫挑着。有次夜行军过封锁线，忽然听见婴儿哭声。按照夜行军纪律，不准吸烟、不准咳嗽，以免暴露军事秘密。罗荣桓听见女儿啼哭，急得冒



火，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怎么搞的！快去叫林月琴抱着，不要再让她哭啦！”

另一次夜行军，拂晓前在小山村宿营。村前高地上一片松林，派哨兵放警戒。天大亮，松林里传来嘈杂声，把罗荣桓吵醒。他听警卫员说，松林里来了许多东北军，马上跑到总务科，怒气冲冲地责问：“张科长！你有头脑没有？怎么随便让人家住松林里休息？”张科长说：“他们是躲鬼子跑来的，我想他们是友军嘛！”罗荣桓更火了：“友军？里面有反共派！你让他们占领高地，如果起了坏心，架起机关枪，我们就要被消灭！”张科长不敢吭声，罗荣桓继续说：“这样大事你不请示，自作主张，乱弹琴！太麻痹大意了！马上叫大家起床，加强警戒……”

当时我正到总务科有事，第一次看到罗政委发这样大的火。原先我也认为“西安事变”以后，与东北军一向友好，鬼子向他们进攻，让他们在驻地休息，不会有问题。听了罗政委的话，好像给自己上了一课。

罗荣桓生活朴素，除了抽烟、吃辣椒、下象棋，别无嗜好。1941年在蛟龙湾开政工会，他和邓克明旅长休息间下棋，两人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得脸红耳赤。肖华在一旁和稀泥，说着“算了，算了！”但他们还争执不休。看来凡事认真的人，大事小事都不马虎。

1945年日本投降，10月中旬我奉命去东北，任安东（今丹东）广播电台台长。10月下旬罗荣桓调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政治委员（司令员林彪）。次年春天，他去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治病，路过安东，在镇江山一座小楼休息。我和几位山东刚来的同志去看望老首长，罗政委谈了东北战争形势，说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决心消灭共产党，大搞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不断向东北运兵，不能有和平幻想。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争房子，争汽车，争沙发，甚至撤出城市时，把沙发装车运走。这怎么得了！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现在还在打仗，怎能这样搞？即使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朴素嘛！不然，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坐不牢！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历史教训。同志们一定要警惕呀！”

听完老首长一席话，下楼时看到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自己动手洗着一大盆衣服，大家深受感动。本来每个首长都有警卫员和勤务员，搞卫生洗衣服，也是他们的工作，可林月琴自己做了，这就是罗荣桓刚说的：“要保持艰苦朴素嘛！”

1946年四平保卫战过后，罗荣桓回到哈尔滨。7月上旬，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精神，统一了思想，公布了“七七决议”。罗荣桓带着夫人及孩子，放心去莫斯科动手术，切除生了肿瘤的左肾。1947年夏天回哈尔滨。我因公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顺便去探望老首长，看他恢复健康，精神奕奕，为他除掉痼疾感到高兴。林月琴安排我住在她家里，和我谈了在苏联的见闻。

为了解决干部子女上学，免除前方同志后顾之忧，1948年春天，罗荣桓倡议办一所子弟学校。当时“东总”政治部，正要分配林月琴当组织部副部长，罗荣桓对她说：“你要当长，就当子弟学校的校长吧！”林月琴筹办学校，调我爱人冷克去任幼儿园主任，每逢星期日，我到学校看子女，常遇到罗荣桓和孩子们玩，他喜欢看我的小女儿打秋千，因此，几乎每星期都能见到他。后来我到前方当记者，回哈尔滨见面时，他总要问问部队情况，特别关心连队政治工作和士兵生活。

从山东到东北，我任过广播电台台长、宣传教育科长，兼过两张报纸的主编，但时间比前多了，常在报上发表些诗歌、故事和短篇小说。进入大城市，看了不少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电影和长篇小说，觉得苏联只打了几年仗，出现这么多反映战争的作品，我军打了20多年，进行过举世闻名的长征，打了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有着大量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很少有人去写。自己亲身经历了战争生活，也有些写作经验，为什么不下功夫争口气、写几部描绘战争的作品？当前东北解放战争正在决战，是体验大规模战争的好机会，于是萌生了到前方工作的念头。

1948年春天，我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大会，听了在延安和大后方一些老作家的发言，讨论过几部作品，进一步受了启发，加深去前方的决心。原先我对本单位领导人的作风有些意见，曾个别坦率向他提过，也在会议上婉转谈过，均不被接受，于是我打了报告，要求调到前方部队工作。该领导人找我谈话，说工作可以动，但只能在他管辖的范围内选择，不同意我去，并暗示给我升官。我跑到“东总”找肖向荣部长，他答应调我到前方部队，准备派人和我对调，并通知我所在单位。单位领导人为此找肖部长谈判，肖仍坚持对调。单位领导人碰了钉子，十分恼怒，一面通知组织送我去东政，一面不经党委讨论，亲自写了一个“通令”，撤消我的行政职务，并在报上公布。“通令”借中央整顿组织纪律的决定，说我不安心工作，不服从分配，是无组织无纪律。

我参军后一帆风顺，很少受批评，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既委屈又愤怒。分析领导人这样做，是怕我到外面散布他的丑事，先发制人。不经组织讨论，不和本人谈话，而且在我调离后下的处分决定，实在荒唐，违背组织原则。我向林彪、罗荣桓和东北局领导写了申诉，要求撤消这个不正当的处分，并附上他的作风问题，逐条详细说明。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在分配我到六纵队任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时，肖向荣同志对我说：“目前战争正紧张，东北局有许多大事要处理，你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我感到一肚子委屈，寻思战争时期要求下前方部队，理直气壮，即使为着日后写作，有成名成家的成分，亦无可告人。不安心工作只是缺点，分配到下属单位不去，只是谈过，并无正式下令，冠以无组织无纪律，完全是不实之词，实在想不通！去前方之前，我给罗政委打电话，请求和他谈谈。当时正准备辽沈战役，罗荣桓工作繁忙，仍抽时间接见，林月琴同志和我约好时间。那天清晨，到罗政委家中，他正和一位兵团干部谈话，月琴同志要我等一等，安排我和罗政委吃完早餐。我不愿占用他



更多时间，简要申明被处分经过，提出自己的意见。罗荣桓耐心听我说完，首先批评我不安心工作，是自由主义的表现。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往往向党要求自由，自己又不给党自由，组织观念薄弱。”又说：“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他希望我到前方好好锻炼，认真改造思想，工作做出成绩来。最后他批评那位处分我的领导“也是自由主义”。

听出罗政委最后的话，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但又觉得他对我批评公正，心里委屈消了一半。但背了个黑锅到前方，还是不甘心，我继续通过六纵党委提出申诉。问题拖到1949年夏天，第四野战军前委在谭政书记主持下，重新进行调查，做出撤销处分的决定，由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在会上宣布。

问题解决了，但罗政委那次对我的教育，使我铭记在心。特别是对“一个人一生难免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这几句话，更是永生难忘。

建国后罗荣桓担任党和国家许多重要职务，还兼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后来旧病复发，又患上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症。我当时转业到北京市文联，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到罗帅家问候，不便多去打扰。

1962年，罗瑞卿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看了话剧《兵临城下》，要我回部队工作。我调回总政创作组。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元帅的心脏停止跳动，19日我和总政干部，列队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吊唁，望着罗帅的遗像，想起他对我的培养教育，感到无限的悲痛，止不住双眼流泪。临终前未能最后见他一面，我感到很遗憾，但罗帅的形象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 赖传珠日记（摘录）<sub>(下)</sub>

## 1944年

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曹丹辉来谈电训队的问题。开生产会议，动员给奖。讨论第二批送中央款，要苏中及浙东准备问题。要二、四师各抽调两个收报机，以增加技术侦察电台之用。罗荣桓已到三师，随带人员多，有暴露的可能。刘顺青不愿到十六旅去工作。敌军南调频繁，国民党飞机炸安庆、荻港。宁波到敌2000余人，修飞机场等。

二月二十九日

答复克诚，转告罗荣桓到淮南军部来就诊。略谈淮大的一些问题。敌情无变化。

三月一日

刘炎同志病重，前去看望，并派人去采购东西给他吃。与崔部长商量罗荣桓来后的房子问题。

三月十五日

上午看小说，写信复韩参谋长，关于反扫荡部署问题。金明来了，并到刘炎那里略谈后回来。询集总存炮弹及文件问题。淮阴、涟水集敌3000人、伪2000人，有报复扫荡企图。敌人南开车辆，每夜8次。徐州到敌飞机70架。敌第七师团开浙江接防，企图未明。通知四师接炮弹及山炮问题。三师给华北500万元，交一一五师去买药。

三月二十五日

大风。到饶政委室开会。桐东顽，组成肃奸队，诱我部队投顽，并已破获2起。苏中送皮棉到胶东，每担1万元，共820担，计820万元，作为送华北款。

十月二十六日

晴。下午汇报讨论卫生部11月份召开卫生会议的内容及精神。四师前方因救护顽伤员，顽自动交出新式电台1架，轻机1挺，并表示感谢。十六旅缴送军部款400万元买布料。四分区行动队在中秋节化装袭击敌人，毙敌4人，缴轻机1挺。山东有500万元买布费要与军部算账，去电三师询问此事情况。七旅、四师前方主力向龙亢河流出动，拟明晨开始行动。桂顽八纵队调莫山、太湖、宿松担任防务。

十一月十三日

晴。上午找粟、叶谈关于整个情势，要他们提出意见。下午到刘那里去玩。美机真（11）日袭南京，被毁1架。5个美国人被二师营救，要他们送军部来。张淦转陈大庆要求，加派一个师到颖上驻扎，以资策应作战。顽六十三师1个团、五十二团、忠救1个团、保四纵队3个团共6个团，有向我浙东以西苏南地区进攻消息。答复浙东，



同意他们第一方案，集中主力于四明山整训待机。罗荣桓尿血病重，将药送去。任援道任江苏省长已于10日视事。四师对华中局的意见可考虑。饶政委到党校上课。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上午开时事座谈会，各部首长均到，我报告了华中情况。淮南路西反顽战斗歼五一二团两个营，七十五团、五一一团各一个营（19—20日），获团长1、副团长2、营长3，击毙营长1，俘虏600多人，毙500余人，伤500余人，缴重机枪12挺、轻机40余挺、步枪400余支，炮2门，电台1架，我阵亡100余人，伤200余人。七军派一七二师1个营经五大庙开梁园整顿。敌对鲁南、鲁中、胶东、渤海、均有扫荡，人数1200至2000余人。淮海敌伪拟向六里河两岸扫荡，并建立据点。五师报称，10月中旬敌运兵甚忙。孔祥熙、何应钦已被撤职，以陈诚任军政部长，王世杰任宣传部长，张治中任内政部长，朱家骅任教育部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宋子文任国府委员，梁寒操任海外部长。

## 1945年

二月十四日

晴天。早饭后党校及各处很多人到此玩，做饺子、弄东西吃。秉泰、冠六、刘长胜部长均来，晚才回去。津浦南下之敌约5个师团（5万余人）是关东军，装备精良。敌前日炸南京。孙象涵调四师分配工作。晚做元宵吃。地方划船的共4批，热闹了1天。天长城敌向杨村出扰。山东杨水之役俘敌伪师长以下1000余人，毙伪军长1名，打通了鲁中与南边之联系。

六月二十一日

晚下雨。讨论昨日饶之报告，至下午5时散会。罗师长来此。顽五十二师已向孝丰西北之小白店进犯，有1个团被围于该处。鲁南顽张里元新三十六师被一一五师击溃，退至微山湖西岸，已抵耿处，仅剩2000余人，为我穷追中。吴化文部有2个团开舍和地区接防。

# 血染沂蒙的“外国八路”

——汉斯·希伯牺牲真相

靖一民

他是一个著名记者，却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在战场上牺牲的；他是一个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

——摘自谷牧《深切怀念汉斯·希伯同志》

对于国际主义战士、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的牺牲经过，他的墓碑上是这样介绍的：“1941年11月30日，希伯同志所随部队与日寇遭遇于沂南县大青山，战斗酷烈，希伯同志投笔持枪，与敌人展开殊死战，不幸光荣牺牲。”这段墓志铭对于希伯的牺牲过程，如同许多史料一样，都没有详写，仅是用模糊的语言进行概述。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文字的背后还隐藏着秘密。

据有关史料记载，1897年，汉斯·希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座古老的城市划归波兰。汉斯·希伯长大后，去德国求学，在读大学期间，曾在莱比锡和斯图加特等地参加过德国的工人运动，因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而被捕入狱，直到一战结束后才被释放。后来，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在德累斯顿等地的报社工作。这期间，他曾到苏联采访，见过列宁和斯大林，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研究中国问题。

1925年，汉斯·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正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他受聘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担任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离职，回到欧洲。五年后，他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秋迪·卢森堡，想带她来中国，又担心秋迪的母亲不同意，就去向秋迪的母亲介绍中国，直到秋迪的母亲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才提出要带秋迪去中国。秋迪的母亲惊异道：“你们还没有结婚，怎么能带她去中国？”希伯笑着说：“这好办，我们明天就结婚。”于



是，他们匆匆结了婚，双双来到了中国的上海。这期间，希伯继续为《中国通讯》等报刊撰稿，并很快与几位外国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不久，他们又一同由海参崴经过苏联去了一趟巴黎，沿途采写了大量抨击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在欧洲住了一段时间后，因希伯仍想为中国的抗日做些事情，他便与秋迪·卢森堡再次回到上海，用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的《太平洋事务》《亚细亚杂志》《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联合阵线来打击法西斯主义，并以锐利的笔锋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汉斯·希伯支持抗日的言行，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注意。1938年春天，经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他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进行采访，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据安排他去延安的王炳南回忆，毛泽东是在窑洞里接见汉斯·希伯的。他们见面后，主要谈论的话题是《西行漫记》。那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一书，已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由于该书比较真实地介绍了中国红色区域的许多内幕，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读了此书后认为：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而汉斯·希伯读了此书后，他却认为斯诺的有些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便撰文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对《西行漫记》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显然读过他的批评文章，与他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斯诺不是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汉斯·希伯听毛泽东如此说，他感到很羞愧，认为还是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能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他不但虚心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还表示要向斯诺学习，深入到抗战一线采访，争取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

或许是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受到了启发，汉斯·希伯离开延安后，不愿再待在上海，而是深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在这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又与妻子一同来到了苏北，先后采访了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然后由苏北直接去沂蒙抗日根据地采访。

1941年9月，汉斯·希伯冲破各种险阻，越过日军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在山东八路军小分队的接应下，于9月12日终于来到山东的滨海地区。他的到来，是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之前还不曾有一个外国记者到沂蒙采访。为照顾好汉斯·希伯，组织上让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的谷牧，负责安排这位外国记者的生活，并尽全力协助他的采访，保证他的安全。陪同汉斯·希伯来沂蒙的共有三个人，一位是他的翻译方练伯，另两位分别是一位八路军干部和勤务员小李。他到了——五师驻地后，又专门给他增加了5名警卫员，还配备了一匹枣红色战马和枪弹，并根据他的要求，发给他八路军军装。

汉斯·希伯是一位十分勤奋的记者，他白天采访，晚上写作，住在他附近的人深夜常常会听到他那台打字机发出“哒哒哒”的声响。有时为了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他不得不靠吃药提神。所以有人说：“别人吃药是为了睡眠（吃安眠药），希伯吃药却是为了不睡觉（吃兴奋提神的药）。”他的采访也十分深入，上至中共在山东的高层领导，下至沂蒙最普通的农民，都是他的采访对象。他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沂南县与费县东北一带（当时属费东县管辖），那里的双堠、盆泉、梭庄、侍郎等村的许多人，都曾见过这位“外国八路”。他经常背着一个牛皮图囊，内装着地图、望远镜等物品，图囊上拴着一只搪瓷杯和一条毛巾，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来沂蒙的时候，脚上穿的是皮鞋，可为了与当地群众保持亲密感，他换上了手工制作的“蒙山鞋”，并与沂蒙人民一样，把煎饼作为自己的主食。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采

访，他先后写出了《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等文章。由于他的身份独特，资料新鲜生动，立论客观公正，这些文章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发表后，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斯·希伯来沂蒙不久，他的夫人秋迪·卢森堡也从上海赶来了。此时秋迪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一家私人诊所的护士，实际上她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优秀战士，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希伯的许多稿件，也是先捎给她，由她传给国外媒体发表的。她的到来，让汉斯·希伯很是兴奋，他像个“沂蒙通”似的，带着秋迪走村串户，看老乡烙煎饼，到田间地头看收地瓜，无论走到哪里，秋迪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但由于日寇的大“扫荡”已经开始，为确保国际友人的安全，山东的领导都劝汉斯·希伯与他的妻子秋迪·卢森堡尽快离开沂蒙，并决定派人送他们去上海。可希伯坚持留在沂蒙，只同意送他的妻子走。首长们只好尊重他的意见，让他留了下来。

秋迪·卢森堡走后，希伯亲自参加了“留田突围战”，写出了《无声的战斗》一文，在——五师主办的《战士报》上发表后，成为根据地鼓舞士气的最好教材。但首长们为了希伯的安全，还是决定让他随山东分局、山东战工会和——五师的机关人员，一同转移到大青山与抗大一分校会合，因为根据情报判断，那里没有敌情。可当这支3000多人的非战斗队伍到达大青山时，才发现那里已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团和刘黑七的新编36师包围了，抗大一分校正组织学员向西蒙山突围。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们的突围十分艰难。当希伯所在的部队突围到沂南县与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沟子时，被日军团团围住，只好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为了掩护机关人员转移，部队首长决定将所有人员组成三个分队，分批向南突围，可希伯拒绝了随第一、第二分队先走，毅然拔出手枪加入到最后突围的第三分队。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等到第三分队开始突围时，敌人已将突破口封锁了。为保护希伯，他的警卫人员一个个都倒下了，连他的翻译方练伯也在绝望之中，服毒自杀了。最后，年仅44岁的汉斯·希伯没能突围出来，壮烈牺牲。这一天，是1941年11月30日，距离他到山东仅有两个月零18天。

关于汉斯·希伯的牺牲经过，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他在与日军作战时，被敌人打死的。长期以来，我们在各种展览、介绍文章中所看到的“官方”说法，基本上都是这样描写的。甚至，直到2011年10月15日，《齐鲁晚报》发表的《汉斯·希伯：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一文中，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道：“他（汉斯·希伯）拿过牺牲同志遗留下的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一发子弹打中他的臀部，鲜血沿着大腿流淌下来。他顾不上包扎，顽强地向敌人继续射击。又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希伯胸前涌出了鲜血。他咬紧牙关，挣扎着要继续战斗，一发炮弹又落在了他的附近……全身五处受伤的希伯终于倒下了。”二是用模糊的语言，介绍希伯的牺牲经过。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文字除了他的墓志铭外，就是谷牧在《深切怀念汉斯·希伯同志》一文中的描写：“汉斯·希伯同志，在大青山战斗中也拿起了枪杆子，和我们的战士一起射击敌人，最后也奉献出了生命。”三是他不愿被日军俘获，服毒自杀的。坚持此种说法的人，多是亲历者。2002年6月，总政干部部原顾问周之同曾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忆大青山突围及德国记者希伯之牺牲经过》的文章，在谈到汉斯·希伯的牺牲时，他是这样写的：“12月1日晚，我随袁仲贤科长去收容时，所遇到的400多人中就有希伯的勤务员小李。据小李说，希伯实在跑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药就倒下去了……与小李同时突围出来的山纵供给部部长马馥堂，在日后向有关同志谈及希伯时，也说他是自我殉难的。”

分析这三种说法会发现，希伯被日军打死之说最不可信。尽管把希伯中弹牺牲



希伯在苏北抗日根据地

的过程讲述的十分生动，但如果把这段文字读上两遍，就会发现这是小说语言，完全是由作者通过想象杜撰出来的。因为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谁有工夫一直盯着别人，看他怎么与敌人作战？如果不仔细观察，又怎会知道希伯先是哪里受了伤，后又被炮弹炸死的？显然，如此描述希伯的牺牲经过，是有人根据某种需要凭想象编造的谎言。而后两种说法，实际上是一回事，那就是：当在战场上找到汉斯·希伯的遗体时，就已经知道他是自杀的，可由于希伯的身份特殊，担心若宣布他是自我殉难的，会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加之对于自杀者不好定为英雄人物，所有了解此事的人才统一了口径，说希伯是在与敌人的作战中，壮烈牺牲的。

身为山东分局领导的谷牧，肯定是知道汉斯·希伯牺牲真相的，但为了维护这位国际友人的崇高形象，他在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里，也没有介绍希伯的牺牲细节，而是用含蓄的语言一笔带过，只说希伯“和我们的战士一起射击敌人，最后也奉献出了生命”。这样描写，既肯定了希伯是在与敌人的作战中牺牲的，又巧妙地回避了他“服毒自杀”这一历史事实。应该说，谷牧的记述是客观而又睿智的，所以后来的许多史料都延用了他的表述风格。

然而，真相是不可能永远隐瞒的。据张西在《抗战女性档案》一书中记载，总政联络部部长杨思德曾让周之同写过一份材料，证明汉斯·希伯是怎么牺牲的。当时，周之同坦率地问：“他是自己服药自尽的，写不写？”杨思德沉思了片刻，肯定地说：“不写！”周之同遵照杨思德的意思，只写了希伯在什么地方牺牲的，并没详细说明他是怎么牺牲的。过了一段时间，周之同特意问杨思德：“他是自己服药自杀的，你怎么不让写？”杨思德回答说：“我怕自己牺牲的不算烈士。”这位老领导的顾虑，与大多数知情者的心理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担心说希伯是自杀的，会损害他的光辉形象，才一直用模糊的语言表述他的牺牲经过。

其实，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不论以何种方式献出了宝贵生命，都是光荣的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希伯的牺牲真相再继续隐瞒下去。这里，不妨再介绍一点他牺牲后的情况。

汉斯·希伯牺牲之后，他的遗体是被当地老乡先发现的，他们见这个人的面孔与中国人不一样，就误认为他是敌人，并无人掩埋他。后来，袁仲贤、周之同等人来清理战场时，看到了他的遗体，才把他就地掩埋，并用庄严的持枪礼向他致敬。三年后，山东军民在赣榆县（抗战时属山东，1953年1月划归江苏省）马鞍山上，为汉斯·希伯建造了一座高大的圆锥形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罗荣桓、黎玉、肖华的联名题词：“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1963年10月，他的遗骨又被迁至临沂地区烈士陵园（今为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并为他塑造了半身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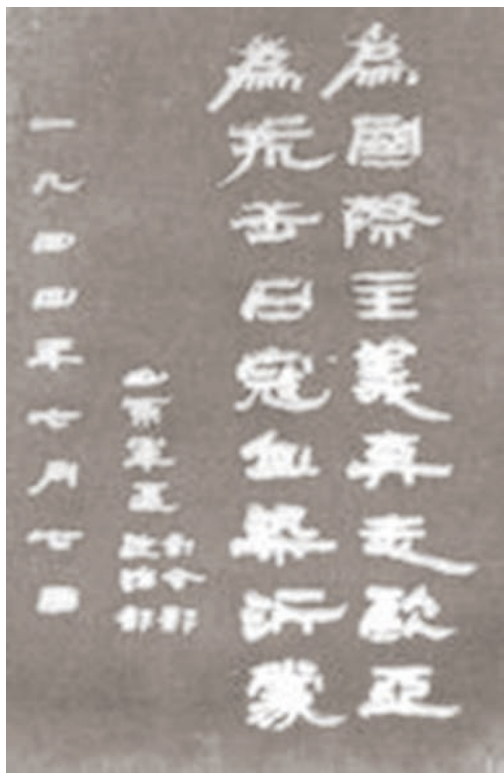
汉斯·希伯牺牲时，他的夫人秋迪·卢森堡正在上海。组织上曾派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叶锦田（后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将希伯牺牲的情况转告秋迪。可那时上海的时局很乱，叶锦田没能与秋迪及时取得联系，直到希伯牺牲四年之后，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有

关部门才与秋迪联系上，把希伯阵亡的噩耗告诉了她。秋迪悲痛万分，立即来到大青山，冲着希伯牺牲的地方呼唤着他的名字，可大青山是寂静的，没有人回应她的呼唤。离开沂蒙后，她独自去了德国。

18年后，依然独身的秋迪·卢森堡忍受不住对丈夫的思念，又万里迢迢重返大青山，为希伯扫墓。为能与丈夫单独在一起一会儿，她让所有随行人员都离开，独自在希伯的墓前坐了很久，哭了很久，她对丈夫说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可从告别时她依依不舍的目光中，大家知道，她还会来为希伯扫墓的，虽然隔着千山万水，隔着阴阳两界，他们的心却永远是相通的！

果然，1981年，年过六旬的秋迪又来了。她先用德文为希伯的墓题了词：“无数先烈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希伯同志是个共产党员，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我们将永远铭记所有的先烈。”然后，她亲手采了一束鲜花放在希伯的墓前，含泪告诉丈夫：“我老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了，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来见你了。以后不能来看你，你要原谅我！”临走时，她在希伯的墓前采了一把刚刚成熟的麦子，对随行的人员说：她要把麦子带回德国，等到她病故之后，会让家人把这些麦子种到自己的坟墓周围的！

秋迪这次告别沂蒙后，直至92岁高龄逝世，再也没能回来。但她在最后的岁月里，完成了《希伯文集》的搜集与整理。1986年，当秋迪将该书的外文原本提供给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中共临沂地委、临沂地区行署破例购买了全部出版的书籍（共计5500册），赠送给国内外相关部门和读者。由此我们可知，秋迪深爱着的丈夫汉斯·希伯，也是沂蒙人最崇敬的国际主义战士，这里的人民一直都在用最真挚的情感，铭记着他的功绩，守护着他的陵墓，缅怀着他对于沂蒙的深情厚谊。如果秋迪·卢森堡在天有灵，她可以看到：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沂蒙人都会把最美丽的鲜花献给汉斯·希伯，因为这里的人民已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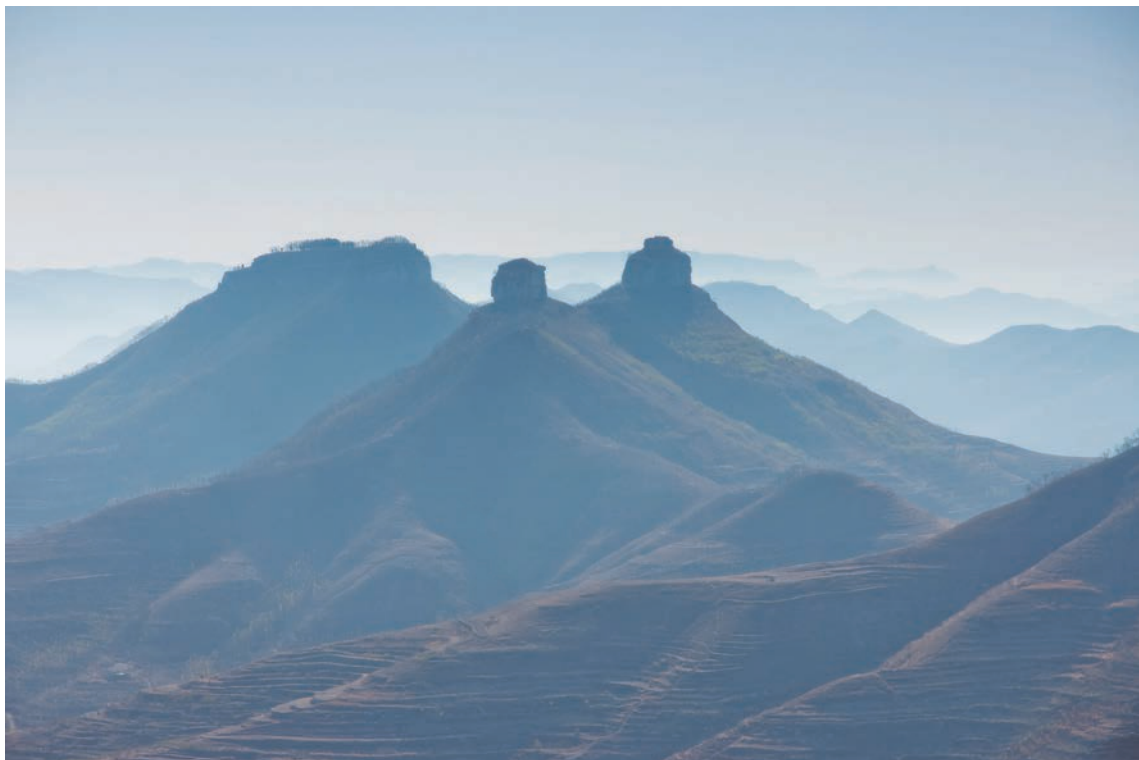
# 扼守岱崮

刘兴立

在层峦叠翠的沂蒙山中，屹立着两座壮丽而雄伟的崮顶，这便是使日军闻名丧胆的南北岱崮。在那暴风雨的年代里，我鲁中十一团八连的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在这里抗击了敌人四十倍以上兵力的进攻，获得了山东军区授予的“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1943年11月，日寇纠集了临沂、临朐、莱芜、蒙阴、沂水等县的精锐部队和大批伪军，准备对我鲁中根据地进行了“扫荡”。军区首长决定以十一团八连少数兵力，凭借南北岱崮的有利地形，吸引敌人的主力，迟滞他们的行动，以便让转到外线的我军主力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扫荡”。13日天明，岱崮周围飘起了日本旗。鬼子的大队人马，分数路拥进了岱崮山区，首先向北崮发起攻击。

南、北两岱崮，相隔约800米，中间只隔一条山梁。两崮各有十几丈高，像刀削一样陡直，矗立在万山丛中。峭壁的隙缝中凿有梯道，可以攀上



顶峰。横跨在隙缝的山岩上，筑有一座小小的瞭望楼，这是上崮的唯一孔道——“南门”。八连把六班布置在这里，连的主力扼守北崮。他们凭借这险要地形抗击敌人，真可以说“一人当关，万夫难开”。鬼子连续攻击了两天，始终被拦阻在崮下，没能前进一步。

两天之后，敌人因受南崮侧击，不利于对北崮的攻击，便把全部力量转向南崮。八架敌机突然出现在上空，咬着尾巴轮番轰炸。爆炸声震耳欲聋，山顶上烟雾漫天。

守卫南门的六班，是全连有名的青年班。班里有三名共产党员，战士们差不多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班长张善才，身高体壮，作战勇敢，而且非常精明。这时候，他看敌人来势汹汹，就叫全班战士蹲在工事里隐蔽，自己观察着崮下的动静。

轰炸一停，鬼子吼叫着向南崮冲了过来。

张善才有条不紊地用哨音指挥着全班，开始用步枪射击，然后把手榴弹投向敌群。鬼子还没冲到悬崖底下，就倒了大半，气得望着峭壁的山崮不停声地喊叫。

我原在团政治处工作，战前，团首长派我带领一个运输组前来守崮部队，头天晚上刚把最后一批粮、水、木料等运到这里。战斗紧张时，我只注意到同志们在聚精会神地射击，当敌人的攻击被打下去以后，才看到有个战士在防空洞的石壁上画着什么。走近一看，见上面已画满了横七竖八的杠杠，中间还夹着几个圆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典故”，就问战士。那个战士告诉我：“这是班长要我们做的杀伤敌人记录，一条杠是打死一个鬼子兵，一个圆圈是打死一个鬼子官。”我说：“这不成了鬼子的签到簿了吗？”做记录的战士笑着说：“是啊！有我们八路军在这里，鬼子不签到怎么行呢？”他那乌黑的浓眉大眼闪耀着骄傲的光彩。

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白天是敌人向我轮番攻击；夜间是我们的小部队向敌人出击。有时我们把地雷埋到山下，炸得鬼子死伤累累。有一天还炸坏了一门小炮和一挺机枪。这样的激战持续了几天，鬼子始终被阻在悬崖底下。“皇军”威风扫地，恼羞成怒，便又继续调集兵力，把岱崮重重包围。

不知敌人从什么地方调来了两门八匹骡子拉的大炮，天天朝崮上轰击。工事一次又一次地被炸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修复。崮顶的泥土翻了身，小树、荒草全倒下来，随手抓把泥土，就可以捡几块弹片。崮上仅存的一口锅也被炸烂了，盛粮盛水的山洞也被炸塌。我们只得每天从坍塌的山洞里挖些干煎饼吃，敲些冰块解渴。没有水，更没有时间，谁也没洗过脸。每个人都蓬着头，原来红润的面庞都变成酱紫色了。身上的衣服越来越破，一缕缕灰褐色的棉花拖在外面，像吊着条条流苏。

一天清早，大队敌机又来轰炸。我正想离开防空洞到前沿上去，刚走到洞口，一阵浓烟带着恶臭迎面扑来，我立时觉得迷迷糊糊，站不住。恍惚中，似乎听到五班副林玉福在喊：“鬼子使用毒气了，用毛巾把鼻子堵起来！”

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嗅着一股扑鼻的尿味，我才逐渐苏醒。这时，只有通信员小殷守在我的旁边，急得满头是汗。开始，我糊糊涂涂地问他：“我负伤了吗？”小殷看我醒过来了，轻声地说：“你不是负伤，是中了鬼子的毒气弹！”我一听这话，心里急得火烧一般，爬起来就往外跑。小殷一把将我按住，向我说明：“我知道你记挂着六班，幸亏五班副林玉福发现得早，没受什么损失，‘南门’还在我们手里！”

毒气没有摧毁岱崮，鬼子又想出了更为无耻的办法。一天黎明，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几个老乡赶上山来。鬼子上到半山，躲在山石后面不动了。老乡们都只胡乱穿着几件单衣，冻得直打战。他们来到山崖底下，一个年纪较大的老乡喊着：“八路军同志……鬼子叫我们上来送信，要你们投降。同志们可不要相信……”老乡说不下去了。我们听了，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冯连长向老乡们讲：“乡亲们，你们回去对



岱崮保卫战英雄班

鬼子说吧！只有打胜仗的八路军，没有投降的八路军！”鬼子见欺骗无效，大炮又朝崮顶轰开了。

崮上最艰苦的地方，当然还是“南门”，那里是鬼子攻击的目标。那座石砌的小望楼早已炸成粉末，“南门”下面的石路也打烂了，像条流沙的小溪。山崖上显出无数白森森的弹窝。望楼后面的交通壕也坍塌不堪，一脚踩下去，灌半鞋沙。这天，我跟冯连长到“南门”上去，正值那个浓眉战士放哨，白天才看出，他头上裹着绷带，上面浸透了血迹，结成一片紫痂。他看连长和我走过来，乌亮的眼睛露出笑意，指指“南门”旁边的地洞，让我们赶快进去。

地洞很窄，是望楼被打碎后，张善才他们从石壁上挖出来的，从这里控制登崮的梯道。张善才和几个战士正在里面休息，一看冯连长来了，数着墙上的“签到簿”就要汇报。我上前一看，墙上杠杠加圈圈，圈圈加杠杠，一片连着一片，不用张善才汇报，一看就知几天来六班又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张善才正向连长汇报，突然，外面一连声地响起哨音，他向大家打了个招呼，带着战士们散到射击位置上去了。冯连长和我也紧跟着直奔山崖，我和放哨的浓眉战士伏在一起，监视着下面。

鬼子借着一道新修的工事，用火力掩护着冲上山来。我身旁的浓眉战士用牙齿咬开手榴弹盖子，一伸手便打出去三颗。鬼子被打倒几个，有一些钻进石缝，盲目地向上打枪。他又端起枪来，瞄准着石缝里的鬼子一个一个“点名”。当他再次向下甩手榴弹的时候，右手被鬼子的枪弹击中了，血流如注。我急着要给他包扎，这时爬到石缝梯道边的鬼子越来越多，我们的手榴弹却快打光了。冯连长和张善才都吹起短促的哨音，这是规定使用滚石的信号。浓眉战士连忙推开我，不顾手上的重伤，把几块大石奋力推下去。大大小小的石块顺着梯道滚下去，一阵石雨把鬼子打得不死即伤，攻击被遏止了。

第14天，崮上到了最紧急的关头。给养和水几乎没有了，剩下的弹药，也只有几

百发子弹和几十颗手榴弹。我们不仅和上级失掉了联系，和北崮之间的联络也给鬼子卡断了。冯连长和李指导员找我商量，这时，我忽然想起一桩事来。

那是我们上崮的第二天，鬼子兵攻山之前，我们听到山下一阵急促的枪响，不久，枪声沉寂下来。我们不知敌人搞的什么鬼。傍晚，冯连长带我们一些人去山下察看。在山脚下的草丛里，我们找到了两个同志的尸体。冯连长辨认出这是二军分区的一个通信员和一个侦察员。从草丛周围的情况看，他们在牺牲前和敌人作过一番顽强的搏斗。通信员的步枪扔在一边，刺刀折断了，枪托砸烂了，枪栓不知去向。他身边散丢着一些粉碎的纸片，嘴角上挂着些嚼碎的纸末儿。侦察员手上套着五根手榴弹弦，面前不少匣枪弹壳。我们在附近的一块石头底下，找到了他的匣枪，枪膛已经空了。看了这种景象，我们心里异常悲愤，默默地把牺牲的战友掩埋起来，就动身回崮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上级首长派他们来岱崮送信，和敌人遭遇壮烈牺牲了。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也就此中断。

冯连长、李指导员考虑半晌，决定派我带两个人突出重围，迅速向团首长请示，决定今后的动向。天黑不久，同志们都到崮边上放石头，招引鬼子打枪。以前我们时常这样袭击敌人，弄得鬼子一宿数惊，渐渐地鬼子也麻痹起来，不再上我们的当了。我和通信员小殷、小宋找个空隙，攀紧铁绳，从悬崖上滑下来。回头望望崮顶，冯连长、李指导员还在俯视着我们。

鬼子怕我们突围，在山脚下燃起一堆堆的篝火，巡逻兵一直在火光中穿梭般走动。到了下半夜，燃烧的篝火余烬未熄，巡逻的鬼子兵想是跑得累了，围着火堆睡起觉来，东倒西歪，鼾声如雷。我们绕山沟，攀山崖，躲过一堆鬼子，又是一堆鬼子，绕到岱崮西北，才钻出了重围。我们终于找到了我团陈宏政委。他听过我们的汇报，当天傍晚就带上队伍走了。他们想尽办法送了一些弹药粮食上崮，同时指示八连相机撤离。

陈宏政委走的时候，把我留在团部。我怎么也不能安定下来，特别是听到岱崮方向响起隆隆炮声的时候，盼望八连同志早些胜利归来的心就更加殷切。

这一天终于来了。八连同志坚持了更加严峻的四昼夜，按照上级的指示突出重围，同迎接他们的陈政委会合在一起，胜利归来了。见到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一面和他们握手、拥抱，一面审视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冯连长头部负伤，鲜血浸透了绷带；李指导员的面容瘦削，显得身材更加修长；张善才腰部负了重伤，身上的棉衣被炸得稀烂。但他们的脸上共同显露着笑容，似乎任何灾难也不能把他们压倒。这时候，屹立在群山之中的岱崮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它像这些英雄们一样闪耀着胜利的光辉……

（作者文中身份为山东军区鲁中十一团八连战士）

# 沭河上的一场保卫战

王宗富

1939年7月，麦收之后的一天下午，沭河的水静静地往东流着。南岸磨山后村（现属江苏省东海县）外的一条从东面新浦、富安一带沿伸过来的黄土路上，有运送山果的驴车，有运粪的牛车，有挑着货郎担的小商贩，还有赶集市、走亲戚来来回回的三三两两的人们……

这时“砰”的一声，沭河上响起了一声令人心惊的枪声，击碎了祥和，划破了宁静，紧接着，枪声密集起来，小孩子们捂着耳朵争先恐后地往家中跑去，沙滩上的羊群受到惊吓，也毫无目的地乱窜起来……一切似乎都太突然了。原来是驻在河北面朱孟汪村的100多名日本鬼子，作为偷袭沭河南岸的先头部队，借芦苇的掩护，悄悄地摸过来了。那时汛期还没有到来，沭河正处于枯水季节，大片的河床已经裸露出来，几十米宽的水面最深处也只到人的腰际。而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个营（村里人已记不清其具体番号）就驻在磨山后村，此时他们正在村外的柳林里以连为单位进行训练。河边上担任警戒任务的哨兵发现了渡河的日本鬼子，第一时间报告了营部。

据磨山后村几位80多岁的老人回忆，当时五十七军的这个营反应很快，迅速在南岸的树林中布防开来，在统一指挥下，向河面上的日本鬼子开了枪，枪声一片，鬼子乱作一团，一批鬼子兵倒在了河水中，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在水中“嗷嗷”地翻腾、挣扎……。沭河保卫战打响了，两岸枪声顿时分不出点儿来。



鬼子的后续部队很快赶了过来，并在北岸的沙滩上架起了小钢炮，向南岸打来，机关枪喷吐着火舌，发泄着鬼子的疯狂。如果五十七军的这个营能够充分地利用岸边林木的掩映，利用河水中的鬼子正在抢渡的有利时机，机动灵活，是完全可以打一场漂亮的沭河保卫战和歼灭战的，至少可以达到大量杀死杀伤敌方有生力量的目的。但这个营的军事长官完全被敌人的火力所吓倒，看到河水中的鬼子正汹汹然往南岸扑来时，急忙打电话给驻磨山南侧朱州村（现属东海县青湖镇）的团部要求紧急增援，但电话又打不通（据村里老人讲，电话线当时被割断了，很可能是敌人暗中派人割的）。看电话一时联络不上，又没有援兵，这位长官竟然慌了神，失去了主心骨，不顾下属的反对，擅自下令全线撤退。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鬼子兵快速地越过了沭河。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长官带头顺磨山北麓往西南方向跑去，后面就全乱了套，斗志全消，无心恋战，也跟着跑起来。丧失了统一指挥，丧失了交替掩护，乱哄哄的，不知是哪个连，竟把一挺重型机枪也当成了累赘，白白地扔到了河滩的杨树林里。涉过沭河的鬼子兵紧追不舍，气焰嚣张，兜着这个营的屁股用机枪猛扫起来，小钢炮的炮弹也在败退的人群中炸响，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官兵倒在磨山北面的荒野上，倒在急匆匆心惶惶败走的路上，倒在血泊中。

这个营有位连长是位血性男儿，急切中在磨山后村西南角的一道山沟里收拢了一部分不愿逃走的官兵，一部分不畏强敌的官兵，以山沟为依托，阻击敌人的追击，掩护部队撤退。日本鬼子发现了新的目标，在汉奸队的带领下，从三个方向向这道山沟猛攻。连长和他所带领的60多名官兵最后弹尽粮绝，全都牺牲在这道沟里，牺牲的连长身子底下还躺着两名日本鬼子……后来，当地群众把这道染满鲜血的沟称之为抗日沟，以纪念这位以身殉国的连长和他所率领的官兵们。

当夜幕降临时，国民党五十七军驻磨山南面朱州村的那个团部才得到消息，派出的增援部队赶到磨山后村时，战事已经结束，鬼子的部队已撤回沭河北岸，磨山后村村南的荒野里已没有了枪炮声。增援的部队从磨山后村里借来了铁锹和铁镐，在磨山北麓山坡上的马尾松林里掩埋了130多具烈士的尸体。增援部队的首长还派人连夜买来了棺木，买来了两床棉被，换上了新军装，把一床棉被铺在棺木里，一床覆盖在身上，厚葬了那位在沭河保卫战中敢于以身许国、奋不顾身、身先士卒的连长。

据村里的老年群众回忆，国民党五十七军的那个营，武器装备还是不错的，不过当时军事长官的恐日情绪比较重，因而在遭到敌军重型武器的打击后，加上电话线路中断，便产生了打不过敌人的失败念头，由于盲目恐日情绪的弥漫，部队还出现了失去控制的一时无法收拾的残败局面，失去了应有的战斗力。

而在这场沭河保卫战中，日本鬼子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在沭河中被打死了30多个人，在那道抗日沟前面的小树林里被击毙了40多人。对于这些鬼子的尸体，日军在磨山后村抓了几十个人，叫他们抬到离磨山后村有十几里路远的古龙岗村（现属临沭县），火化后，装入骨灰盒中运走。有十几个伤得比较重的鬼子兵没有被送到医院去，也被运到了古龙岗，火化时，这些鬼子兵不愿活活被烧死，鬼哭狼嚎，有的从火里往外爬，又被扔了进去，惨不忍睹，一片狼藉，令人不寒而栗。

今春清明节前，沭河南岸的磨山后村来了一位须发皆白的台湾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老人来到村里一些年轻人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抗日沟前，祭奠在沭河保卫战中阵亡的那些英灵。老人说，他是当年从朱州村赶来增援的那个部队的一名排长。



# “蒋家天下丁家党”

——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丁玉隽



丁惟汾

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和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独揽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让陈果夫、陈立夫制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1917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 “唯丁是赖”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山东日照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八。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后，父亲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400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借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我的父亲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

后，就再没有与何香凝有私人之间的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我父亲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忌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 “革命家庭”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山东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看到那些“革命家庭”，我就想，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否则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他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 “蒋家天下丁家党”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父亲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合影前排左边第一个为丁惟汾

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我父亲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在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我父亲，但我父亲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个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父亲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 国共合作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我父亲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他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1926年，父亲与毛泽东

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

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中国到日本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 最后一次见父亲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

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赶到上海去送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内部刊物《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党员都不知道他。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香港文化界人士）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 东吴大将军诸葛瑾

老 秦



诸葛瑾（174—241），字子瑜，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东吴重臣，官至太傅。诸葛瑾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胞兄，其子诸葛恪也在东吴官至太傅。诸葛瑾，“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虽说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出身，但到了诸葛瑾父亲诸葛圭这一代已经是明显没落了。尽管如此，诸葛瑾还是沿袭了后汉时期很多年轻学子的传统，“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约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母亲章氏去世，诸葛瑾“居丧至孝”，并且“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但不久诸葛瑾的父亲诸葛圭也病故，一家人顿时失去了依靠。不得已，诸葛瑾一家只好投奔叔父诸葛玄。诸葛瑾到达江东的生活，史料中没有记载，但从诸葛瑾自己所说的“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等情况看，应该还是比较清苦的。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由于孙权姊婿弘咨的推荐，诸葛瑾才正式成为孙权帐下的一员，从而迈上仕途。

215年，诸葛瑾奉命出使蜀汉，要求刘备归还荆州，最后以分界结束。

219年，跟随讨伐关羽，封宣城侯、绥南将军。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吕蒙病逝，诸葛瑾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黄初二年（221年），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诸葛瑾给刘备做书曰：“陛下老远来至白帝，就是因为吴王侵取荆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肯讲和，此小人之心。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诸将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222年，孙权受封吴王后，封诸葛瑾左将军，督公安，假节，封宛陵侯。同年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三国志·夏侯尚传》）潘璋前来救援，而魏兵日渡不绝，潘璋认为：“魏势始盛，江水又浅，未可与战。”便将所领，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作筏适毕，伺水长当下，尚便引退。同年，孙权称王，封诸葛瑾为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

226年，孙权得知魏文帝去世后，于八月出兵攻魏。命左将军诸葛瑾部兵分两路进攻襄阳（今湖北省），亲自率军进攻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西南）。孙权一路为魏军所败，遂撤兵而走。而诸葛瑾则被司马懿击败，并斩杀吴将张霸，斩首千余级。十二月，升任骠骑将军。

（公元234年）夏五月，权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权率大众围合肥新城。是时蜀相诸葛亮出武功，权谓魏明帝不能远出，而帝遣兵助司马宣王（司马懿）拒亮，自率水军东征。未至寿春，权退还，孙韶亦罢。

236年，孙权北征，派右都督陆逊与中司马诸葛瑾攻襄阳。陆逊派亲戚韩扁怀揣奏疏上报朝廷，返回途中遇到敌人，敌人抓获了韩扁。诸葛瑾听后，十分恐慌，写信给陆逊说：“大驾（孙权）已还，敌人得到韩扁，将我们的虚实全部打听清楚了。而且河水快干了，最好是赶快离去。”陆逊接报后并未作答复，却催促人种葑豆（一种蔬菜），与众将领下棋射箭游戏，一如平常。诸葛瑾知道后说：“陆伯言足智多谋，



他这样做一定自有考虑。”

于是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知道大驾已还，再不用为此筹谋，便专心对付我们。如今敌人已经守卫了要害之处，兵将已经出动，我们自己应当首先镇定自如以稳住部队，然后再巧施计谋，退出此地。如果今天就向敌人表明我们要走，敌人会以为我们害怕了，必然会来威逼我们，那就是必败之势了。”

于是二人秘密定计，令诸葛瑾坐镇舟船，陆逊率领全部兵马向襄阳进发。敌人素来惧怕陆逊，见陆逊要攻襄阳，立即退回城中。诸葛瑾便引船而出，陆逊慢慢整顿好队伍，大张旗鼓地走上船。敌人不知究竟，反而不敢追击，于是陆逊全军安然退出。

241年四月，吴帝孙权分兵四路攻魏：卫将军全琮率军数万出淮南决芍陂（今安徽寿县南）之水，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今安徽六安东北），车骑将军朱然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大将军诸葛瑾攻柵中（今湖北南漳蛮河流域）。五月，全琮入侵芍陂，朱然、孙伦围攻樊城，诸葛瑾、步骖侵掠柵中，“六月，（司马懿）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帝以南方暑湿，不宜持久，使轻骑挑之，然不敢动。于是休战士，简精锐，募先登，申号令，示必攻之势。吴军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斩获万余人，收其舟船军资而还。”司马懿自请出兵往讨。同年，诸葛瑾病故，死时六十八岁，死前命人葬礼应该简单进行。

诸葛瑾墓在常州市郊北港乡连江桥下塘，墓为土墩，占地约五亩，高四五米。墓前原分左右两墩，一为印墩，一为剑墩，清道光年间，曾在墩下锄得篆文“诸葛子瑜之墓”小玉碑，出土汉代玉锁、玉猪及铜镜、陶瓷器皿等。今墓已不存。

诸葛瑾的能力到底如何，如果从他所历任的职位上看，似乎有点文武全才的味道，比弟弟诸葛亮还要强。文职方面，诸葛瑾担任过长史、地方太守，武职则有中司马、绥南将军、左将军、大将军等等。诸葛瑾的后半生似乎在军事方面涉足较多。不过，虽然诸葛瑾打过的仗的确不少，但是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其实是不怎么样的，虽然算不上是个常败将军，但属于军事能力低下。正如《三国志·诸葛瑾传》注引《吴录》中所说的那样：“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画，无应卒倚伏之术”，军事非其强项。然而诸葛瑾精通为官之道，方方面面应付自如，算得上是个孙吴政坛的不倒翁。

首先来看看诸葛瑾是如何应付自己的主子孙权的。《三国志·诸葛瑾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诸葛瑾）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话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不仅如此，诸葛瑾与其他的皇室成员也是关系密切。《三国志·孙皎传》中就提到：“（孙皎）轻财能施，善于交结，与诸葛瑾至厚”。这些关系，都能为诸葛瑾地位的稳固打下良好的基础。

诸葛瑾能在孙吴政坛屹立不倒，一直身居高位，这与其性格上的小心谨慎、官场上的左右逢源、处事深谋远虑，都是密不可分的。三国志作者陈寿评曰：“诸葛瑾、步骖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黎东方于《细说三国》一书指出：“没有周瑜、鲁肃，便不会有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没有诸葛瑾，也不会有猇亭之役以后的吴、蜀言归于好。”由此可见，诸葛瑾与周瑜、鲁肃等人，同为孙权所倚重，在吴国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

# 傲岸不羈的李方膺

凤 凰



清朝康乾时期，在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画派——“扬州八怪”，其思想性格和绘画风格，均有异于封建正统，带有明显的叛逆性和独创性，对近300年来的画坛，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通州籍画家李方膺亦赫然位于“扬州八怪”之中。

李方膺（1695~1755），清代画家。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抑园、白衣山人，乳名龙角。通州（今江苏南通）人。曾任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职，因遭诬告被罢官，去官后寓扬州借园，自号借园主人，以卖画为生。与李鱣、金农、郑燮等往来，工诗文书画，擅梅、兰、竹、菊、松、鱼等，注重师法传统和自然造化，能自成一格，其画笔法苍劲老厚，剪裁简洁，不拘形似，活泼生动，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

李方膺既不是扬州人，又未如黄慎、金农等久住扬州卖画，何以得侧身于“扬州八怪”之列？原因有三：一是人品、画品和其他七人（李鱣、江士慎、高翔、金农、黄慎、郑燮、罗聘）相当；二是通州于雍正元年（1723）前，还只是一个属于扬州府的散州，李方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入学时，籍贯便是扬州府通州，所以他是广义的扬州人。三是更重要的方面，李方膺愤而辞官、寄居金陵借园后，迫于生计，常往来于金陵、扬州之间，卖画以资生活。

## 一、仕途三折

其实，李方膺扬州卖画前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曾当地方官凡30年，遭受过几次沉重的打击。李方膺出身宦宦之家，父亲李玉铨历任两广及云南知县、知府，后转福建粮驿道，主管粮政、交通，两度任京官，后任福建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为更新吏治，实行全国荐才，李方膺以“贤良方正”受到举荐。次年，李玉铨到京城述职，34岁的李方膺随父进京。觐见时，雍正皇帝怜悯李玉铨年老，问：“有儿子和你一同来么？”对曰：“第四子方膺同来。”问：“何职，且胜官否？”对曰：“生员也，性戇，不宜官。”雍正笑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即召见，特旨交主管河南、山东的河东总督田文镜委派为沿海知县。

雍正八年（1730）李方膺任山东乐安知县。当年夏秋之际，乐安大水成灾，万家漂橹，情势紧迫。李方膺未得上司批准，开仓赈济，下令动用库存皇粮一千二百石，以工代赈，募民筑堤，缓解了灾情。但随即因私开官仓被青州府弹劾。总督田文镜未予置理，反而称赞李方膺胆识过人，有功于民。灾后，经实地考察，李方膺写下《小清河议》《民瘼要览》《山东水利管窥》等著作。雍正十年（1732）因功升任莒州知州。

雍正十二年（1734）他奉调返任乐安知县，同年冬改任兰山知县（今属临沂市）。雍正十三年（1735）他因反对新任总督王文俊的垦荒令，上书直陈弊端，触怒上司，被罢官入狱，成为当时震惊朝野的“兰山冤案”。民哗然曰：“公为民故获罪，请环流视狱”，兰山、莒州一带农民成群结队，自带鸡黍米酒前往青州监狱探视。狱吏不许见，老百姓就把带来的钱物、食品往监狱的高墙里扔，留下的酒坛子把监狱的大门和甬道都堵住了。这场冤狱，一拖三年。直到清乾隆元年（1736），乾隆追究起开垦失策忧民之事，罢王士俊，才得平反。那天二鼓，文书传到青州，当夜李方膺就被释放。李方膺入都觐见，立候在军机房丹墀西槐树下，大学士朱轼指给诸王大臣说：这就是劝阻开垦的知县李兰山也。觐见后，调安徽以知县任用，李方膺请假回乡奉养老母而不就任。

乾隆四年（1739）后，李方膺父母相继去世，在家服丧六年。守制期满，受命任安徽潜山县令，权知滁州府，不久调任合肥县令。这时又逢饥荒，李方膺按过去做法，自订救灾措施，且不肯“孝敬”上司，遭嫉恨，太守加之莫须有的“贪赃枉法”罪名，罢官。

李方膺前后做县令20年，竟三次为太守所陷，他感慨万千地说：两汉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

## 二、扬州卖画

李方膺罢官后在南京借居金陵（南京）项氏花园，自号借园主人，常往来扬州卖画以资衣食。他在晚年有诗说：“我是无田常乞米，梅园终日卖梅花”，画上也常钤“换米糊口”之印。他与居住在大诗人袁枚和篆刻家沈凤过从甚密，时常联袂出游，时人称之为“三仙出洞”。在南京，李方膺还结识了篆刻家丁敬。丁敬傲岸不群，当时千金难得其一印，但李方膺却得到过丁敬刻赠的好几方印。有人觉得很奇怪，丁敬自己在《印跋》言明：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画梅，傲岸不羁。罢官寓金陵项氏园，日与沈补萝、袁子才游……予爱其诗，为作数印寄之，聊赠一枝春意。

李方膺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作



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欹侧蟠曲，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离奇”之句。还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工书，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诗草》，仅26首，多数散见于画上。传世画作为《风竹图》《游鱼图》《墨梅图》等等。

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对李方膺的画艺极为佩服，评价极高。墨竹是郑板桥最拿手的绝技，但他《题李方膺墨竹册》仍认为李的墨竹“东坡，与可畏之”。连画墨竹的圣手苏轼、文同都“畏之”，可见其评价之高。至于对李方膺最擅长的墨梅，则论述更具体，评价更高，郑板桥在李方膺逝世五年后所作的《题李方膺画梅长卷》中说：“兰竹画，人人所为，不得好。梅花，举世所不为，更不得好。惟俗已俗僧为之，每见其大段大炭撑拄吾目，真恶秽欲呕也。晴江李四哥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以难见奇，以孤见实。故其画梅，为天下先。此卷新枝古干，夹杂飞舞，令人莫得寻其起落，吾欲坐卧其下，作十日功课而后去耳。”从“扬州八怪”中声望最高、成就最大的郑板桥对李方膺画艺的推崇中不难看出当时李方膺在“扬州八怪”中的地位。

### 三、叶落归根

乾隆十九年（1754），寄居金陵、往来扬州卖画五个年头的李方膺因身体不适回到家乡通州。袁枚有《送李晴江还通州》三首诗相送。第一首有句云：“才送梅花雪满衣，画梅人又逐花飞。一灯对酒春何淡，四海论交影更稀。”李方膺病重时，曾勉力致书袁枚：“方膺归两日，病笃矣！今将出身本末及事状呈子才阁下。方膺生而无闻，借子之文光于幽宫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这是托袁枚为已写墓铭。待到袁枚收到这封绝笔，李方膺已离世多日了。据送信人说：“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书也”。也即清乾隆甲戌（1754）的九月三日，这年他59岁，得的是“噎疾”（食道癌），医者曰：“此怀奇负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药所能平也”。临终前，他在自己的棺木上写下一生的遗憾：“吾死不足惜，吾惜吾手！”



# 蒙山道教初探

赵 芃

蒙山为山东道教胜地。主峰龟蒙顶海拔1156米，仅次于泰山，故蒙山又称“亚岱”。境内层峦叠嶂，巍峨壮美，道教文物古迹、庙宇、石碑石刻荟萃，素有“三十六洞、七十二峰”之称，是道教著名的修道养生之福地，在山东道教发展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在蒙山龟蒙顶南麓，有祭祀蒙山的万寿宫道教遗址，为蒙山道士贾文改建。蒙山南侧有古颛臾国遗址，颛臾风姓，伏羲之后，后为鲁国附属。

## 一、蒙山道教及由来

蒙山自秦汉时起，即为求仙访道之士隐修之所。至唐宋时，蒙山道教已久负盛名。

宋代，蒙山已成为沂蒙山地区道教活动的中心。宋宣和元年（1119）五月，徽宗赵佶赐蒙山玉虚观住持道士贾文度牒紫衣。《蒙山道德院帖碑》



记载：“左右街道德院，承尚书省札沂州状，敦遣道人贾文赴院审验，逐具奉闻。奉圣旨特给赐度牒、紫衣，今来本人礼金坛郎凝神殿授经、签书右街道德院事、知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丁安行为师，已经秘书省填托，须至指挥。上除已牒文沂州照会，令道士贾文赴神霄官安下外，令帖道士贾文仰照会。宣和元年五月□日帖，付贾文。”该贴文由金代蒙山佑德观兼灵显庙道士周守先主持追刻立碑，门人琅琊张子仲书丹，沂阳刘彦仁刻石。<sup>①</sup>

## 二、蒙山道士及管理

蒙山从隋唐到清末，历代道士人数众多。魏晋时，蒙山道士就以炼丹著称。

宋徽宗赐蒙山玉虚宫道士贾文度牒、紫衣后，蒙山道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金代，玉虚观改称佑德观。贾文的弟子周守先住持佑德观，兼管灵显庙。同时，据《玉虚观三清殿榜文碑》落款记载“住持、前沂州都道周”。可知，周守先还曾任沂州都道，证明当时蒙山佑德观住持道士是由当地较有资历和身份的人来担任。另外，《玉虚观松柏林记碑》记载的蒙山道士还有玉虚观道士皇希全、蒙阳道士刘彦仁、副知观事道士杨希真、监斋道士荣义江、前知玉虚观事道士邓希庆、尚座道士宋议格。“蒙山玉虚观即祖师贾成公（贾文）之遗迹焉。有门弟子三百余人，道正周公为上足。周公门弟子皇希全主灵显香火二十余年。”<sup>②</sup>“清末北京白云观第二十大方丈高云溪原为蒙山白云岩道观道长，后赴天津，又到北京白云观，被提升为方丈，慈禧太后封他为总道教司，掌管全国道教事宜。”<sup>③</sup>葬于平邑蒙山白云岩玉虚观遗址东，并立有墓碑记载其出家修道经历。

## 三、道教活动及修仙

蒙山道教主要活动范围在平邑县境内的万寿宫（即宋代的玉虚观）、白云清虚观、大洼玉皇庙及凌云宫等地。光绪八年吕正嵩《白云岩清虚观香火亩数并序》记载：“余厌弃尘嚣，归隐此观，师事何□□，于师立持山林约数十年，临羽化时委任于余、不敏恪承道命，夙夜□劬允峦□，隙地遍植松榭花果杂树，今之森然擢秀杵古木之间者皆是也。余又出初隐时，携余贲置田二十余亩并观中旧业统计二百余亩，恐契久夫捡□□地址亩数，条列诸石资后之承事者考为。养云道人吕正嵩撰命徒本书”<sup>④</sup>。说明其时有庙田二百余亩，后又经道人王义光、善士杨奉三、颜崇吉等置资增加三百余亩，累计不下六百余亩，分布在坦埠岭、柘沟、杨谢、孝义等蒙山前广大地域。又在柘沟村建有粮仓，所产粮食，除供道众自需外，还广施善粮，赈济周边百姓。<sup>⑤</sup>金代道教在蒙山一代活动频繁，香火盛行，求雨祈福，驱鬼遣恶。白云岩清虚观，在近五百年间的发展中，留下了众多的人文古迹。据《玉虚观三清殿榜文碑》记载：“龟蒙大山有英烈昭济惠民王祠宇一所，比年遇衍，时雨常致，请道士贾成公先生取圣水祈祷感应，使一方年谷屡丰。今访闻贾公已聚集材植，见于山前修盖三清殿宇一所，焚修香火，祝皇帝圣寿无疆。”<sup>⑥</sup>

位于蒙山南麓鲁埠村的《鲁埠真元观记碑》记载了蒙山道士吴希景在蒙山修道、作斋醮活动和金代真元观创建的过程：“昔贺真人、老莱子、杨真君辈皆得道是山。复有贾成公于蒙山之阳建□□，珠壁交映，则壮丽从可知矣。”“有吴公者，鲁埠人，性格介，好弹射网罟，后观《黄录》，折节悔过。焚香祝上帝曰：‘若臣有道契，则铁香匙，火著可卷矣。’言讫，随手如绵。”“于是受业于周公，法名希景。”“梦受戒于真元君，自是所施神应，拯救沉痾，请灵符者，上至



王公贵族，下及黎庶，日有数百人。一日，皇妹公主久苦宿疾，告治辄验。馈遗不受，惟留龙凤镜一枚，以照妖魔。凡灵异莫能尽载。时人瞻风而至，愿留门下者多矣。故葺法宇，因从师周公于野，徘徊四顾，见东有神游岭，西有洛河，三江口，玉泉水出于南，紫荆关耸于北，议曰：‘此可兴建。’即构三清殿。鸠工之日，鬻得片石，乃断碑焉。即古‘真元观’基，有‘大唐天宝三年’字。”<sup>⑧</sup>

关于蒙山道士周守先弟子皇希全修道成仙之事，在蒙山《玉虚观松柏林记碑》中有记载：“公享年七十有九，于大定二十八年仲夏七日而仙化。公以淳古勤实，焚修持诵，朝不怠，誉于一方。常行运气补脑之术，虽年迈而不衰。将化之日，时甚亢暘，忽有云雾蔽覆庭，乃冥然而逝。肌体芬香，色变若白玉，四肢如生，蝇蚋不近，遂举公真葬于道林。阴云复垂，窈窕掩讫，天降雨几半时许，阳光灿然。公尝语曰：‘我死有异。’后果应耳。”<sup>⑨</sup>

#### 四、宫观遗迹及派别

蒙山道教宫观主要有万寿宫、清虚观、玉皇庙及凌云宫等。蒙山万寿宫始建于宋代，初名玉虚观，后改今名。现存殿宇为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重建，正殿三楹，原祀玉皇大帝，梁柱朱漆，宏伟壮观。据《平邑县志》记载，玉虚观原为颛臾王祭祀蒙山神处，又名谒蒙祠，《水经注》称蒙祠。宋雍熙年间改祀颛臾王，为颛臾王庙。宋神宗、哲宗年间，守庙高士贾文笃信道教，收纳道徒甚众，政和元年（1116）宋徽宗诏见，赐以“紫衣象笏”，后乞归蒙山，羽化后赐谥号“清虚文逸成公先生”。时古蒙祠改为道院，名为玉虚观，规模渐渐扩大，道教活动盛极一时。清康熙年间达到鼎盛时期，正殿主祀玉皇，成为道教活动的中心，后改玉虚观为万寿宫。白云岩清虚观及承天宫、泰山行宫、朝天宫、慈宁宫、玉皇殿等道观，均有道长主事，教徒多为全真教派。<sup>⑩</sup>

蒙山承天宫在万寿宫上一公里处，始建于明代，清嘉庆年间（1796—1820）重修。原有建筑多已不存，今唯余砖木结构神殿三楹等，昔为供奉后土神之所；宫外



石坊前，跨山溪筑一座三孔弧形桥，宽约4米，长10余米，取名“迎仙桥”，桥身由大石叠成，桥头饰以龙头，兴建于建宫之际，重修于清代。宫上行一公里处有一平台，台上筑殿三楹，古雅端庄，建于明代，重修于清代，主祀东岳泰山神，故而人名泰山行宫。凌云宫建于何时无从考查，据残存重修庙碑记载，明崇祯年间由五代祖门道人捐款复修，推断当在明朝中叶兴建。大洼玉皇庙及附近的秋峪、天麻场、三官庙、后白岩等庙宇道士，多为火居道士，受大洼玉皇庙管理，为同一派别。从蒙山中路拾阶而上，在白云岩山门两旁的高峻石壁上，分别刻有“龙”“虎”二个摩崖大字，一阴一阳，直径约50厘米。在十八拐中段可见“徘徊云岩”崖刻。过丹桥附近石壁上镌有“清虚古观”四个大字，字大40厘米，为篆书。其下有记载该观山林土地位置和数量的文字。<sup>⑨</sup>

蒙山白云岩道士墓区保存金、元、明、清、民国时期数十座道士墓碑，其中内容清晰、保存完整的碑文有16座，内容保存最为完整，并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白云观二十代方丈高仁峒墓碑。碑高1.7米，宽1.06米。碑文正面刻有“大清华山第十六代上仁下峒云溪高先师之位”，背阴为“敕赐金冠紫衣寿山真人白云堂上第十六代上仁下峒高先师之洞”。碑文内容如下：师籍任城，世称望族。幼具慧根，至弱冠时，厌弃尘世，不为诗书□，遂归山学道，师事第十五代上本下固李度师座下。苦行修持，越数年，辞师出山云游，足迹半天下。所至老师宿儒争相过从。及得戒后，慧力益深，道心愈笃。凡道之所在，无不身体而力行之。至光绪初，群推为京都白云观监院。又举为方丈。凡七登律坛，得度者三千有余。所著《云水集》《大觉阐微》行于世。上荷我朝慈禧皇太后敕赐金冠紫袍，御前焚修，诸多荣膺，不能枚举。而泽被道教之处，尤难详述。至如以六百金修葺本山庙宇，固为报本返始之意。然而未终其志，竟于光绪三十二年羽化在白云祖堂。即函仙蜕，砖而塔之。春秋六十有六。蒙两宫殊恩，赐祭一坛，号封寿山大真人，皆异数也。本朝王公侯贝，及各国钦使，并俄国驸马普科第，额其门曰：“道普大同”，又塔联云：“名满大千世界，功在第一丛林”，又铭曰：“蒙峰之英，洙泗之灵，维此哲人，应运而兴。十年炼气，万里游行。金台飞舄，领袖上清。募增田亩，创建园亭。葵芹时献，金紫荣膺。庚辛浩劫，钟簴无惊。欧斐奥亚，齐赞文明。乡邻振恤，劳界经营。戒坛七启，薄海欢迎。道非常道，名非常名。具三不朽，是曰长生。”呜呼！我师之事实，既蒙当道君子铭而旌之矣，弟子等肤识疏学，亦何敢妄为置喙。然其维持道统，丕振宗风，一生殆无遗事。使不言之，不惟祖德不彰，亦不能示后世也。兹值刻石，以垂不朽，仅就我师实迹，略述梗概，俾后之向道者知所观感云尔。

碑文反映了高仁峒对道教发展的贡献及蒙山道教在中国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

#### 注：

①②③⑥⑦⑧《平邑文物》，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版。

④该文刻在白云岩玉虚观遗址下方一岩石上，字面朝南，东西横卧，刻有碑文岩石高3.92米、宽2.20米。

⑤⑩参见赵玉春：《平邑蒙山白云岩清虚观初考》。

⑨《平邑县志》，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

# 黄石山惨案 (上)

陈永杰

黄石山惨案旧址位于沂水县黄山铺镇蛮庄东南黄石山。该山海拔339米，山体东西长，西、北两面是数丈高的悬崖，南面和东北面是长长的陡坡，山势险要。在清末捻军活动时，就筑有可备防守的石寨墙，后又修建了一些简陋住房。凡遇土匪骚扰，周围群众多习惯上山躲避。1933年7月2日（农历闰五月初十），国民党军八十一师展书堂部运其昌旅、唐邦植旅，以剿“大刀会”为名，在黄石山上屠杀大刀会会员及无辜民众3700余人，凡黄石山周围村庄家有参加大刀会的人，无不遭此惨劫。有的全家被杀光，甚至连住娘家的女儿、外孙，也不能幸免。山上屠杀干净后，国民党兵又窜进周围十几个村庄，见人就杀，大小不留，繁盛的村庄顿时成了人间地狱。这就是山东历史上著名的“黄石山惨案”。

—

因为“黄石山惨案”是由大刀会引起的，所以必须先从大刀会说起。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特别在张宗昌祸鲁的年代里，官府和豪绅地主对



黄石山

广大人民群众的压榨剥削，横征暴敛，犹如敲骨吸髓，弄得民不聊生。仅田赋一项，一年就要预征数次，而且一两田赋银子需折合几元钱。除正粮（田赋）外，还有地方附加和其他苛捐杂税，名目之多，令人难以想象。诸如：教育费、地方建设费、军队支应费、军队过境费、花生地亩捐、花生米捐、小榨捐（榨花生油）、大榨捐（榨豆油）、白油捐（花生油称白油）、篓头捐、小车捐、过路捐、羊只捐、羊毛捐、屠宰税、牙行税等，不胜枚举。农民在这些“赋”“税”“捐”的重压下，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的政治欺压，就更无生路。在这种官逼民反的年代里，许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因而在一个时期内，沂蒙山区几乎遍地是土匪，大股上千，如刘桂堂（即刘黑七）、李常纲等；小股成百，如刘天增、杨广胜、李朋钧、石增福、二八连……等等；其他三十五十、或者三五成群拦路行劫的零星散匪，则更不罕见，严重时，有些道路甚至断了行人。

这些土匪中的若干人，甚至匪首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开始当土匪时，主要还是对付官府、地主，以后才发展到绑架勒索，所到之处，不论贫富，掳掠一空。为避匪患，贫苦农民就只有借助于封建迷信团体以自卫。于是，大刀会应运而生。这个封建迷信组织号称“入会后上了香、吞了符、学会了掐诀念咒和‘喊号子’，就可以‘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当然是假的，但大刀会在各村发展起来后，夜间往来香堂，形成守望相助，一有匪警就一齐出动，打起仗来一喊“号子”便蜂拥而上，致使本地小股土匪不敢冒犯，逐渐销声匿迹，邻县的大股土匪亦闻风丧胆，不敢前来骚扰。到1931年间，匪患基本肃清。可以说，大刀会对防控匪患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不过为时不久，地主豪绅便纷纷参加进去，逐渐控制了大刀会的组织，如匪首杨广胜、李朋钧在燕子河被歼后，整个大刀会组织，便基本被地主阶级所掌握，各级头领也大多是地主老财。

大刀会也称红枪会，其派系甚多，如红旗会、黑旗会（也叫青旗会）、黄旗会、五旗会（也叫五带子会）、铁板会、黄沙会、金钟罩、铁布衫等等。莒县、沂水一带，大刀会四派，以青旗会为最盛，五旗会次之，红旗会、黄旗会甚少。

自从大刀会被地主阶级掌握以后，在他们内部有冲突的时候，往往都把大刀会作为自己的工具，彼此进行角逐。青、五、黄之间关系较好，红旗会和以上三派有矛盾。红旗会头目于兰田是大地主，他想用红旗会争夺地方权力，青旗会和五旗会不服，因此双方常常起摩擦，甚至动武。如沂水县第六区的地主张恒远、牛寿元、夏孟寺的和尚了庆等，都曾借助大刀会的力量和第六区区长杜绍曾进行过斗争。莒县红旗会与青旗会的斗争，也是如此。

莒县红旗会与青旗会的矛盾很深，以致发展到武装冲突。但由于青旗会人多势大，红旗会人少力孤，打不过青旗会，于是红旗会会首于兰田便勾结购买了当时驻防莒县的国民党军队八十一师运其昌旅，为其撑腰。国民党政府和运其昌为了搞垮大刀会，也就趁机从中挑拨离间。运其昌借调解之名，袒护红旗会，青旗会不服。

那时，参加红旗会的多是有点儿身份的或吃官饭的。当时满堂坡、丰台一带的红旗会就驻在其首领丰台地主王宗堂的围子里。有一次，是在1931年或1932年麦季，青旗会五团在丰台与红旗会开战，双方都有伤亡，红旗会伤亡大，青旗会阵亡3人。

1933年夏，韩家官庄青旗会会员左福被红旗会的人抄了家。左福的女婿是大李家庄的青旗会会员袁福堂。袁福堂听说岳父被抄了家，就报告了本村会首。这时会首已把会友们集合起来准备抵抗运其昌，他一听说自己的会友受了红旗会的欺负，就把队伍开到了孟家庄。红旗会这时也把人调集起来，开到袁家庄的一条沟里，准备迎战，两相对垒，剑拔弩张。这时下店村绅士袁仲一、黄旗会会首杜历山、大李马庄铺子掌柜李升庭三人出面调解，才避免了一场械斗。

同年，五旗会和红旗会在小薛庄也发生过一次冲突，双方都调了不少人。红旗会会首于兰田带领他的两个儿子亲自出马，五旗会会首钟志道也上了阵。这时国民党莒县政府和驻军旅长运其昌出面“调停”，他们袒护红旗会，钟志道不服，结果被运其昌抓到莒县县城杀害，接着五旗会另一会首刘东也被杀害。

1933年农历五月初，莒县垛庄乡乡长李寿辰派区丁到盛家垛庄庄长盛阶家催征8块钱的防务捐。李寿辰平时为虎作伥，催征钱粮极为苛刻，经常带着十几个区丁挨户催征，凡遇不交者，即拘捕关押。

盛阶是青旗会会员，对李之敲诈早就不满，区丁来催征就更为生气，当即回答拿不出，结果被捆到乡政府关押了起来。盛阶之弟盛富及其侄等五六人都是会员，见盛阶被押，便集合了本村的会员至乡政府，将盛阶抢回。为惩罚李寿辰，第二天，青旗会会首梅景玉向各村传令调兵，组成了几千人的队伍围攻乡政府所在地盛家垛庄，从上午开火一直打到下午。

这时，李寿辰的姑表兄弟王文楼，到莒县县城请来了运其昌的部队。运其昌亲带一个步兵营到盛家垛庄，谎称“和解”，叫梅景玉暂且退兵，有事慢慢商量。梅答应解围退兵，但必须交出李寿辰作为讲和条件。运其昌佯为应允，但并不兑现诺言。梅景玉退兵至岭西，不久就识破了运的欺诈手段，于初五又围攻了盛家垛庄，并一枪击中了正在训话的运其昌的左腿。运于是以全副武装向青旗会发动猛攻。结果运其昌被包围，几乎当了俘虏，幸赖其第三营从诸城换防回到莒县，才解围逃脱。

五月初，梅景玉还会同沂水、费县的旗会援兵，在沭河边的夏庄，与运旅打了一仗，双方互有伤亡。

五月初九（6月1日），青旗会退至黄沙沟，又进行了一次反击，村上男女老少全部投入了战斗。从早晨黎明，一直打到下午4点，不分胜负。后莒县县长要求讲和，经双方谈判，运旅撤出了黄沙沟。

几次交战，运旅均未能获胜。运其昌恼羞成怒，声言非把青旗会消灭不可，运其昌对莒、沂两县的青旗会怀有刻骨仇恨。因此，“黄石山惨案”的悲剧就在这些小规模武装冲突中慢慢地孕育着。

莒县大刀会与运旅在黄沙沟交战后，青旗会也认为势成骑虎，知道运其昌一定要进行报复。因此莒县青旗会便通过田瑞写信给沂水县大刀会头子张恒远求援，结果被张拒绝。于是田瑞又写信责骂张恒远无良心，并声言要把会众拉到沂水去闹，对张进行威胁。

田瑞原来是放牛出身（也有人说是个要饭的），是个穷人，不知什么时候加入大刀会，竟成了莒、沂两县青旗会的总老师。张恒远燕子河剿匪及围攻北良水杜绍曾区公所时，田瑞曾带领莒县的青旗会徒众援助过张恒远，所以当张恒远拒绝援助莒县青旗会之后，田便敢于以信责骂和威胁张。

张恒远是沂水县第六区东营庄地主，开设油坊买卖，是六区一带的青旗会头领，也是该会是总老师，平常会众都称他为“四老师”。张曾亲自率领青旗会众在燕子河（渊子河）打过土匪，将匪首杨广胜、李朋钧及其匪众，全部歼灭，以后又打了北良水杜绍曾区公所，因此，张在沂水县的青旗会中颇有声望。

下面说说杜绍曾全家被杀的起因和经过。杜是沂水六区北良水村人，家庭是中小地主，其父杜次章，曾任过沂水县财政处的会计，在财政处下设的支应局负过责任，也曾当过六区区长。杜姓是沂水六区的封建势力派之一，尤其杜姓自杜经三当了沂水县警备队总队长后，势力就更大了。杜绍曾早在临沂五中读书时，无所不为，为社会乡里所不齿。1927年前，杜曾考入黄埔军官学校，1927年秋流浪到南京，不久就投靠了张苇村（当时国民党政权是西山会议派掌权），在南京充当一名小职员，1931年考



黄石山围墙

入山东区长训练班，由于杜善吹捧钻营，毕业后回沂水县就被委为第六区区长。

杜绍曾自从当了第六区区长后，经常自称是张苇村嫡系亲信，并说与当时的沂水县长焦常荫是拜交弟兄，因此便狐假虎威，任意妄为，不可一世。当了区长之后，借口兴办学堂，没收了夏孟寺的庙产，占用了庙址，并将该寺和尚了庆和牛家小河村地主牛寿元，捕押在他的区公所。了庆和尚是夏孟寺的主持，也是一个恶霸地主和作恶多端的“妖僧”。杜绍曾把这两个坏蛋关押起来，并不是为了除恶，而是为了敲诈。当张恒远以大刀会名义要求杜释放他们时（了庆和牛寿元也是大刀会头目之一），杜绍曾不仅不听，反而态度更加蛮横，出言不逊。张恒远见谈判不成，便调集了一部分刀会群众将杜的区公所团团包围，进行武装威胁，声言不释放了庆和牛寿元绝不罢休。而杜绍曾也早有准备，在他第一次拒绝了张恒远的要求后，便从县城要来了一部分警备队。及至张恒远真的调集刀会群众包围区公所，他便更加恼怒，立即下令向刀会开枪，恰巧，杜绍曾第一枪就将张恒远的儿子击毙，这就更加激怒了张恒远，于是又调集了更多的刀会群众，向圩里攻打。他们首先割断了区公所和县府之间的电话线，使杜无法向县里求援，继之便将圩墙攻破，杜见势不妙，便将全家集中在一个炮楼内，企图负隅顽抗，以待援兵。大刀会攻破圩墙后，即蜂拥扑向这个炮楼。此时杜绍曾看到炮楼也非保命之地，便跳下炮楼向良水河方向逃去。在杜绍曾跳下炮楼不久，炮楼大门即被打开，攻入炮楼的大刀会众，见楼下存有不少土灰药，便立即点燃起来，随着土灰药的升发，炮楼的被炸，杜绍曾全家也被炸死，连他的妹夫李泽生（区公所文书）也未幸免。杜绍曾本人虽然跳出炮楼未被炸死，在他逃至良水河滩时，即被大刀会众赶上杀死。（一说为会徒用镢头刨楼的墙基，很快把楼刨倒了。杜绍曾的父亲当场摔死，杜绍曾和他的哥哥、妹夫等摔下楼来后向西逃跑。会徒追到良水河边，将他们全部杀死，还逮住两个区丁，押回东营庄杀了。见邵春林等口述，张茂萱、窦宪诺整理《张恒远和以他为首的沂水青旗会》，载《沂水县文史资料·第一辑》）这就是当时震惊全省的沂水县大刀会的第一次暴动。

当时统治山东的韩复榘，对大刀会的这次暴动，并未采取适当措施，只派了他的民政厅长李树椿进行了一番“罪不加众”的“宣抚”，将县长焦常荫以办理不善的罪名撤职而已。虽然如此，但也种下了下次惨案——即黄石山惨案的祸根。



# “大青山突围”之谜 (下)

大荒堂主

## 九、抗大一分校的军事实力及五大队“机断专行”

抗大一分校到达山东后，学员队减为三个，“即二、三、五大队，二大队于1945年改为建国大队，专门训练地方基层政权干部，三大队训练特种兵，（机枪、炮兵、工兵、防化）及女生队。五大队训练连排职军政干部。另外，还有上干队、参训班、教员训练班，直属训练部，校部领导。”（《抗大一分校史实》）

到达山东后，抗大一分校每期学员大约2500人左右。其中二大队每期500人，包括女生队。

其武器装备，我们可参考一下大青山突围之后，1942年5月14日罗荣桓同陈光、陈士榘上报第一季度一一五师军事实力：抗大一分校人数三千一百零二；各种枪一千七百零三，机炮二。其中，五大队属于军事大队，团的编制，按照1941—1942年山东八路军的标准配置，每个战斗员应该配备枪械一支、4枚手榴弹、15—20发子弹；每中队（连）三挺轻机枪，每挺轻机枪150—200发子弹。二大队三人一支步枪、几发



子弹和一枚手榴弹。三大队性质特殊，单兵武器配备略弱。

白富山在《我所经历的大青山突围》中说：“第三、第五大队又称‘军事大队’，学员主要由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营连排级干部组成，来自前线，独立带兵打仗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但他们大部分赤手空拳，仅有学校配发的几百条各种型号破旧步枪，还没有刺刀，弹药严重不足。我们班每人一支大枪，土洋都有，十发子弹，两枚土造手榴弹。”白富山来自三大队，其中对五大队的描述，不可完全采信。

《谷牧回忆录》中曾认为五大队的学员均为军事干部，有很强战斗力。许多回忆录也曾提到五大队三、四中队有机枪。可以肯定五大队是山东八路军的军中翘楚。当然，同日军相比，无论单兵素质，战术合成，武器装备都还有所差距。

大青山突围之所以打得残酷，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麻痹大意，仓促迎敌，这个后面还要涉及到。警戒哨报警时，五大队正地处一线，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五大队主动压上，主动迎击日寇，判断正确，处置得当。“当时，日军一个中队携九二步兵炮一门，已抢占了大青山一号高地，并向我前哨连急袭。担负警卫全校重任的第五大队，遂向第二、第三号高地扑去。大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都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干部，他们是在没有接到校首长命令的情况下，‘机断专行’抢占制高点的。日军系主力山岳部队，自然知道抢占制高点的重要性，也拼命向二、三号高地冲去。敌我双方在突发的战斗中，都按通常的军事原则，争先展开兵力，争先抢占要点。第五大队先敌一步的‘机断专行’，为我机关人员突围，争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山东省情网——大青山突围》）“机断专行”为大青山突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没有五大队的主动掩护，后果将不堪设想。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动。

日军是下午四点半撤退的，五大队三、四中队的勇士们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只知道他们在战斗，却从来没有怀疑是否有集结号。

## 十、朱瑞、黎玉对大青山突围评价的疑点

现在流传的较广的是郝云虹回忆录中，朱瑞和黎玉对大青山突围的评价，单凭一个人的回忆本身就不牢靠。其一是大青山突围的当天晚上，学员尚未收拢，战场还未打扫，战况不明，派人向山东分局汇报什么？其二，抗大一分校隶属一一五师领导，越过直接领导汇报似乎也不靠谱。

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军委作出决定，致电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朱瑞、彭德怀、左权，中原局：“为了保障华北、华中联系，必须加强山东。我军在山东力量近八万人，而作战指挥至今尚未统一。中央和军委认为，加强山东方面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为加强山东的先决条件。因此有如下决定：（一）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二）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三）将山纵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四）为团结山东干部，在山东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加强抗大一分校，吸收山纵及一一五师中上级干部（连、营、团长）在抗大一分校成立上干队，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战术知识，交流经验，融洽感情。（五）山纵及一一五师的后勤机关采取必要步骤，逐渐做到统筹统给，合理分配。（六）某些后勤机关可以合并。（七）望即召集分局及军政委员会讨论实施本指示，并将讨论结果电告。”

8月2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致电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原局并彭德怀、杨尚昆等，报告分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决定，表示完全接受，并对具体执行方面提出意见，其中有：“（三）为统一山东干部教育与训练工作，在分局下设干部教育委员会，由陈士榘、罗舜初、周纯全、李培南、李林组成，陈士榘为书记。”

9月5日罗荣桓主持山东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决定》，明确指出：“（六）统一学校管理。抗大一分校由军政委员会直接管理，并开办上级干部（营、团）队。以一一五师之学校收训主力部队及特科生，改属抗大一分校一大队。地方干部统由抗大分校收训，另设大队。为加强对学校之领导，组织学校委员会，以陈士榘为书记。”

阎捷三、乔志学、郑德厚《抗大一分校敌后办学记》中证实了抗大一分校的归属问题。“11月28日傍晚，奉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由泰莱山区返回沂蒙根据地中心区休整。途经岸堤时，派人向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请示任务，并于次日拂晓到达东蒙山东南部彩云山一带。”

大青山突围的当天晚上，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陈士榘）就到达了战场附近，不向一一五师首长汇报，舍近求远不正常，更有违背组织原则之嫌，这是很严肃

的事情。其三，山东分局机关就在包围圈内，而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这时正同罗荣桓在一起，向山东分局汇报要跑到沂南岸堤山东纵队。那里没有朱瑞。其四，黎玉党内分工政府，军事上负责与罗舜初率领山东纵队反扫荡，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只有向上级汇报的权利，不会轻易表态。最后一点，如此重大军情，校领导不出面，只是派了一个军事教员去汇报，似乎说不过去。

## 十一、大青山突围的教训及其后果

1月22日罗荣桓同陈光、陈士榘致电集总并报中央军委，对1941年11月5日至12月25日沂蒙反“扫荡”作出检讨并总结经验，其中说：“（四）严重经验教训。①此次虽侥幸未被敌聚歼，但损失极端严重。尤其是（缺五字，似为“德记者希伯”）、翻译方练柏及许多重要干部牺牲。由于我们对敌后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够及为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较和平环境所麻痹，致使“扫荡”到来之前未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和中央、军委、集总各种指示，作反“扫荡”全盘的充分的动员和准备，以致“扫荡”到来时手忙足乱，无法掌握。”

白刃《忆罗荣桓元帅》：“1941年冬天，5万日伪军“扫荡”沂蒙山区，在大青山突围中，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类似省政府）的机关损失惨重！战后罗荣桓在《战士报》上撰写社论，总结反“扫荡”工作，文中有‘平时歌舞升平，战时则狼狈不堪’的词句，就是对那种不顾战争环境的太平麻痹思想，进行严厉的批评。”另外还可以参考《罗荣桓传·刘少奇来山东与四年工作总结》

大青山突围的后果及影响。高华在《历史漩涡中的朱瑞》中认为：大青山突围以及反扫荡中一系列失误，导致“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未得到重视。进入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前来参加。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前往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电文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

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光、罗荣桓等：“山东的军事统一指挥，是要你们来负责的。为了实现军事上的统一领导，提高你们自己的威信，团结一一五师与山纵，消灭山东领导方面的不团结的现象，你们必须以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首先检查自己，责备自己。”为了便于一一五师领导展开自我批评，电报根据所得材料，提出：在沂蒙反“扫荡”的军事指导上有错误。

“持久战的原则，应竭力保持行动的自由，且务须注意不陷于决战。在敌人‘扫荡’时，要爱惜有生力量，在腹地进行游击，主力则转到外线，打通交通。在敌疲退之际，酌看形势，或打其一路，或以其他方法给以损失。在‘扫荡’中，指挥机关应迅速转至敌人外围，隐蔽于安全地区，以保持不间断的指挥。敌人惯用反复‘扫荡’，应提高警惕，避免损失，高级指挥机关之会合，尤须注意。以上数点，是此次‘扫荡’中的严重教训。”

1942年3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出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指朱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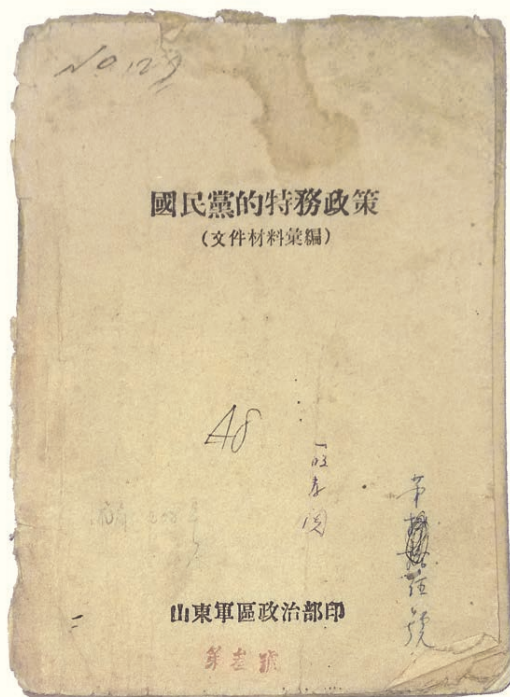
1943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统一指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1943年8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9月朱瑞被调离山东。

大青山突围的主要当事人周纯全，亦于1943年3月经山东军区报中央军委批准，由八路军正旅级干部降职为山东根据地滨海行署工商管理局长监委。

大青山突围留下了许许多多谜，有些谜面全无，何况谜底。譬如说国民党五十一军原有一部在沂南张庄一带，反扫荡之时他们的作用，已无从考证了。

# 《国民党的特务政策》

高 昂



《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文件材料汇编）》，由山东军区政治部1944年7月1日编印，为党内文件。本书内收录了抗战时期（1938年到1942年上半年）敌后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文件20份，如“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山东目前（匪）区工作报告大纲”等等，内容涵盖了国民党对山东根据地的特务部署、计划、办法、策略等，在组织上积极组成特务团体（如锄奸小组、推进锄奸特情队、特别党员服务哨、抗八团等），到利用掌握会门道教来对抗共产党八路军，即所谓的以组织对组织，并推行其所谓特殊义务教育来掌握其反共思想阵地。深入根据地推行其特教工作，并以内奸政策与恐怖手段来达到破坏目的。同时，这些文件也暴露了国民党的种种歪曲理论和极尽污蔑的谎言。

山东军区政治部强调：“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在目前虽已引起了我党政军民的注意，但由于对他的反动特务阴谋办法了解不够，而仍有不少麻痹现象，给予反共特务活动以有可乘之机，。而遭致不少地损害。”“印发此书旨在引起各地负责干部地注意收集研究联系当地环境，及本身具体情况来改善自己的工作，以加强防奸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巩固自己，团结自己。”

该书为孤本，由于是党内文件，本书在山东军区政治部印下盖有“第三号”编号章，封面其他地方签有“沐局008号”、“一股存阅”等字迹，应是发至县团级的佐证。

# 王小古年谱 (续)

刘瑞轩

## 1979年 己未 65岁

1月，为向国庆30周年献礼，作《锦上添花》中堂（孔雀牡丹）。除送山东省展出外，又为学生王启桓复制一幅。为学生开栋作《墨竹》轴。

1月23日，为文管会陈希法画《鸳鸯》并题诗：“柳荫深处藕溪旁，五月初荷未上妆。……”书楷书胡厥文《悼周总理》五言诗二首。

新春，因整日忙碌有感，在刘墉书金人“绝句”后续四句，以达此情：“家藏千卷富，身得一生闲。茅屋经年补，柴门终日关（金人诗）。惟我谈何易，关门比较难。且歌心力健，自己劝加餐（小古续）。”

春节，书行草《毛主席咏梅词一首》。为景云作《仙客来》作题诗“仙客远从海上来……”作《米豆蝻蝻》轴，题诗：“只因庄稼施农药，如此昆虫见不多……”为小友作写意《小猫》。书草书日本策彦上人诗一首。



元宵节后，水利指挥部李肃请小古到家中作画。

2月，为北京友谊宾馆作画12幅，计有：《葡萄》4幅，《墨牡丹》4幅，梅、荷、樱花、仙客来各一幅。其中《仙客来》为工笔。为《山东国画选》作画数幅。

春，为宋景云大夫作《米豆蝻蝻》，并题诗：“只因庄稼施农药，如此昆虫见不多。……”为桂林作《葡萄》轴。作《叫蝻蝻》。于洗砚池滨作《山茶芭蕉》轴。为冯奇作《墨牡丹》中堂。作工笔《天女散花图》，并题诗：“先教布雨洗尘埃，喜得东方曙色开。为使人间成锦绣，散花飞下九天来。”作工笔《白牡丹风蝶》中堂。作《仙客来》轴，并题诗：“仙客远从海上来，御寒冒雪自然开。……”书行草对联：“赤道雕弓新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作写意《樱花三月艳阳天》。作写意《葡萄蝻蝻》，并题诗：“粒粒葡萄粒粒圆，未尝滋味早流涎。”书魏碑体邓完白长联“沧海日，……”

4月15日，作彩牡丹《娇容三变》，题诗：“天地无不变，有显有不显。……”为刘某书颜体邓石如长联。书草书孙过庭《书谱》片断。

4月，和马世治一起六下菏泽。菏泽艺术馆领导请小古做老师，为当地培养一批画牡丹的人才。小古允诺后，遂办了一个10多人的美术学习班。参加者除去年的人员外，有美术工厂的陈玉梅、巨野文化馆的陈朋同和武斌之子武战、单县文化馆刘金镇等。小古先讲知识，后带领学员去牡丹园写生，再由学员每人画5—8张。经老师修改定稿，最终选出100多幅，供艺术馆收藏。小古自己画了各种品种牡丹40幅。这次活动断断续续共用了五个月。

此次花会，来自各地的画家有：四川美术学院的何方华、南京艺术学院的喻继高、广州美术学院的杨之光、浙江美术学院的何水法等，小古和他们结为画友，并分别给他们画了牡丹画。

为向国庆30周年献礼，艺术馆又组织小古和马世治、赵天楼、杨冠芬、陈鹏等12位画家合作巨幅牡丹《春满人间》，共画八大色、十七个品种、21朵花，用工笔重彩画成。此画于1980年春发表于《中国牡丹深圳展览会特刊》。

菏泽地区举办“写生牡丹画展”，小古有作品参加。

在菏泽，为福相作《白牡丹》，作彩牡丹《昆山夜光》，题诗：“愈当白昼愈平常，愈处深宵愈放光。……”作工笔《紫牡丹》。用流水作业法，用一个来小时，为艺术馆许汝良和女画家杨冠芬等五人各作写意《葡萄》一幅。

回临沂路经曲阜，在与日本书法代表团互相交流的笔会上，书榜书“东方巨龙”四个大字，震惊了日本友人和周围观众。

4月26日，为悼念周总理，作《海棠花》，并题诗：“回首当年痛五衷，海棠花盛忆丰功。……”同日，作七绝《赠于希宁老画友》：“揖别兄颜十五年，几经风雨几晴天。……”

5月，作《樱花牡丹》，题诗：“双花香万代，一幅共千秋。……”

5月9日，作工笔《樱花》，并题诗：“描来一幅美人魂，群玉山头赛太真。……”

5月3日，作彩牡丹《山花烂漫》，题诗：“神女嫣然笑，山花烂漫红。”

夏，作彩牡丹《玛瑙盘》斗方一幅，为诗人孔小划作《白玉版、紫珠盘》，并题诗：“不着浮华相，挥来墨牡丹。……”为景云大夫作《墨梅》，题诗：“古今多少画梅花，我画梅花不入家……”

5月6日，作《墨牡丹》，题诗：“落花情无限，花香是墨香。……”

6月29日，山东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为成立齐鲁书社，选收小古的画《葡萄蝻蝻》一幅。

秋，作《米豆蝥蝻》，并题诗：“只缘庄稼施农药，如此昆虫见不多。”

秋，作苏轼诗意画《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写意《蝴蝶兰与蝶》，题诗：“大花园里蝶纷纷，假假真真最感人。……”秋，为厚山作《粉红牡丹》。

8月17日，小古因患肺气肿住院，瑞轩前去探望。晚住聋哑学校。

8月29日，致浙江画家何水法信，请他帮助代购宣纸等画材。同日，致江苏画家喻继高信，托他代购宣纸及国画色。

9月，为刘彦成作写意《白菊》。

10月，为庆祝建国30周年，作《大桃图》，并题诗：“长征二万五千里，建国辉煌三十年。……”作写意《鸡上树》中堂，题诗：“许多农谚非迷信，岂只云霓判雨晴。……”

本月，为省一轻工业科学研究所作画5幅：《桃李莺燕》《葡萄叫蝥》《牡丹樱花》《米豆叫蝥》《仙客来》。后二幅为工笔。

冬，为教育局刘彦成作大写意《白梅图》，并题诗：“盘根错节不知年，磅礴犹龙倚托天……”（为山东省美展作《梅花》亦题此诗）为源松作写意《酒醉杨妃》中堂。作巨幅写意《牡丹群蜂》（4尺宣×3）。从今冬到明年1月，为王汝涛主编的《太平广记选》作绢本工笔人物插图16幅。1980年10月出版。为招待所吴汉升作写意《白菊》轴，并题诗：“东篱西圃凭君赏，流水高山慰我情。……”为学生李宗轲作写意《荷残菊绽》轴。为元良侄婿作写意《白牡丹》。为宝高作水墨《青松》，题陈毅诗。为刘大夫作《山水》一幅，并题诗：“扁鹊华佗寄此中，兴来落笔写云峰。……”为梦白学弟作写意《菊花石》中堂。于郯城书魏碑体《敬业乐群》四个大字。

本年，作品还有：

为利和作《红遍万山巅》（杜鹃）。为承启作《山茶水仙》轴。为言畅作写意《葡萄》轴。为常田同志作《牡丹白鸡》轴、《松鹤》轴。为龙起书行草《邓完白长联（沧海日……）》。去郯城为学生罗洪杰作写意杜鹃《看画如闻杜宇声》中堂。为天楼作《松鹤图》中堂。为菏泽刘凤西作《双凤图》轴。为立璐作写意《猫蝶图》轴。为××作《山茶水仙》轴。为学生刘某作《柏树八哥》扇面，题“八百长龄”。为永良作写意《白牡丹》轴。为杰三作《芭蕉山茶》轴。为常白作《大鸡牡丹》轴。为朝文书颜体《悯农》诗一首。为松云作《墨梅》。为培良作《葡萄》轴。为元良侄婿作《白牡丹》。为仁静、肖琴作《樱桃》《枇杷》。书行草郭沫若《赠日本朋友》诗一首。为刘某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联。为张宏作《葡萄蝴蝶》。为魏宾作墨竹《雨后春笋》。为健生作写意《牡丹》。作写意《花鸟四条屏》（包括春“紫藤双燕”、夏“荷花翠鸟”、秋“菊花鹤鹑”、冬“柳树八哥”）。

为台湾将回归祖国，作《莺燕图》，并题诗：“桃李春风暖，山河盛事忙。……”作山水中堂《松风云海》。作人物画《天女散花》中堂，并题诗：“生平本不事矜夸，偶作王婆自卖瓜。……”作写意《枇杷》轴，题长款：“古人有把琵琶写成枇杷者，因而便有“枇杷不是这琵琶，只怪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弦管尽开花。”一首讽刺诗，读之颇具厚意。看画读诗，不是更增趣味耶。作写意《陶靖节诗意》扇面。作写意《墨荷蜻蜓》轴。作写意《烟雨荷塘》轴。作写意《葡萄》中堂。作写意《芭蕉菊花》，题：“栽菊以明志，种蕉以学书。”作写意《葡萄》轴。作山水中堂，题：“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作写意《彩牡丹》大中堂。作写意《桃柳双鸭》轴。作写意《仙客来》轴。作写意《芭蕉菊花》，题：“冒霜开最旺，斗志最坚强。”作写意《墨牡丹》轴。作写意《莺

歌燕舞》。书行草文天祥《正气歌》片断。为刘某书赵朴初《庆东原词》扇面。

### 1980年 庚申 66岁

元旦，给临沂地委请求调动的呈文，并附七律诗：“为求艺术庆丰收，去志已坚请莫留……”同一信又抄一份，呈给谷牧副总理。为刘炬作《墨梅》轴，并题诗：“不拘陈法自成家，不画烟霞画早霞……”

1月，调到临沂教师进修学院（原临沂师范，后改名为教育学院）工作。10月方从聋哑学校移居进修学院。为天楼书行楷联：“天上有香能盖世，人间无色可为邻。”

同月，接省政府通知，携小女到济南珍珠泉宾馆，为人民大会堂画巨幅牡丹《国色天香》（约300cm×250cm）。共八种色，20多个品种。包括白色：昆山夜光、玉版、白玉、梨花雪；大红：火炼金丹、状元红、大胡红；蓝色：蓝田玉；粉红：赵粉、银粉金鳞、酒醉杨妃、花二乔；黑：青龙卧墨池；紫色：大棕紫、魏紫、葛巾紫；黄色：姚黄、金轮黄；绿色：豆绿、娇容三变。此画共用二个月完成。

随后，又给南郊宾馆画二幅大画：一幅为布置在门厅的《墨葡萄》，一幅为大幅《牡丹》（略小于人民大会堂那幅）。赋诗《再客珍珠泉有感》：“一别珍珠泉，茫然二十年。……”赋诗《题珍珠泉梅花》：“珍珠泉馆近湖滨，旧地重游倍觉亲。……”为剪纸艺术家贺艺民作《墨牡丹》，并题诗：“洛邑传千古，挥来墨牡丹。……”

2月，为松云作《青松图》。

2月28日，以作品《松竹梅兰》及人物画《颜真卿怒书（争座位）》，参加临沂地区迎春美术摄影书法展览。

春，为光正作《墨梅》大中堂，并题诗：“古今多少画梅花，我画梅花不入家。”

仲春，作写意《牡丹花下戏双雏》《云中牡丹》《红牡丹》《墨牡丹》。

谷雨，于济南珍珠泉，为魁章作《墨牡丹》，为鲁特作《墨牡丹》中堂，为金凯作《墨葡萄》并题诗，为喻勇作《白鹭图》。作写意《葡萄》轴，作写意《芭蕉山茶》、《惯画梅花不惯诗》。

4月初，为原副省长余修作画一幅，收到后，余修于15日复信一封，回赠字一幅。不几天，又在家宴请小古，画家崔辉作陪。

4月，带学生马世治、李厚杉、崔培鲁等第七次去菏泽，参加牡丹花会。住在赵天楼家，同吃、同住、同学习。菏泽地区书协副主席李荣海邀请小古到市委给领导作画4天，共几十幅。同时，李荣海拜小古为师，学习画花鸟画。

于菏泽，为振源作绢本《水仙》小斗方，并题自作咏水仙诗一首，又书自作五言诗一首。

夏，为永胜作写意《葫芦蝥蝥》。

夏，为加林书篆书“攀登高峰”扇面。

夏，与冯凭合作《蟹芋图》（冯作蟹），小古题款。

5月，为芸安作《红白玫瑰》中堂。作写意《双猫图》中堂。

6月16日，临沂地区工艺美术学会筹备会在商业宾馆开会，小古被选为名誉会长（会长为二轻局局长崔玉衡）。小古在会上发言，题为“我对工艺美术学会的认识”。

本月，作写意《双猫图》轴。

7月，日本出版画册，收入小古的《鸡上树》《米豆蝥蝥》二件作品。





8月，为祝临沂艺校成立，去艺校作写意《牡丹》大中堂，题：“诚如飞燕瘦，未若玉环肥。”

9月25日，在政协第五届临沂县委员会上，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作写意《玫瑰花开天地香》中堂。

10月，因劳累过度，健康欠佳，去汤头疗养院疗养。赋诗一首：“汤头疗养院，处处老少年……”同月，作《庾岭梅花十月开》。同月，为振祥作《芙蓉白鹭》中堂。

11月，作《白菜辣椒》大中堂，并题诗：“香酥最是抱头白，快口无如椒子红……”为世治作《芭蕉菊花》，题曰：“不修芭蕉为听雨，爱写菊花是傲霜。”同月，作写意《芭蕉茶靡》，题曰：“开到茶靡花事罢，芭蕉分绿上窗纱。”

腊月，为京剧演员王素芳作写意《白月季》。并题诗：“素质超群艺，芳心妙绘声……”书行书陆游七律《病起》一首。同月，为豫剧演员杨美兰作《兰竹图》，并题诗：“美德梨园传后学，兰花金谷盖群芳……”

冬，作写意《八哥梅花》《芍药多姿》。作《荔苳》轴，题曰：“佳盘进苳，千秋永以为戒。”书楷书联：“是何意态雄且杰，不露文章世已惊。”作没骨《水仙》，题诗：“翠带飘飘动我情，铺开绢素写云英……”至次年1月，又题长款。为李钧作《葡萄》。为昆扬作写意《五彩牡丹》中堂。书楷书杜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写意《蟹菊图》。为姚子扬大夫作《梅花》，并题诗。作《蟹菊图》轴。

本年2月加入中国美协。8月被评为副教授。向领导建议办大专美术班。

本年度作品还有：

受钱勤来之托，为香港友人《天天日报》主编司徒丙鹤作工笔《仕女图》。为祥平作《墨葡萄》中堂。为崇尧作《墨葡萄》中堂。为宏毅作写意《墨梅》，题曰：“画梅须画骨，大节此中存。”为玉华作《绿牡丹》中堂。为某某作《白菊》轴。为祥华作写意《葡萄》轴。为志廉作《粉红牡丹》。为彦成作《墨牡丹》，并题诗：“草草挥来意更真，莫嫌狂怪画花人……”作写意《墨牡丹》，并题诗：“眉攒义愤看唐史，笔带深情画牡丹……”作写意《芍药多姿》小中堂。作写意彩牡丹《豆绿》，并题诗：“豆绿非纯绿，嫣然酒晕腮……”作写意《雄鹰》中堂，题曰：“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为学生刘某作写意《桃柳燕双飞》中堂。书魏碑体黄山谷七绝《酴醾》轴。



# 兰陵古桥探踪

虎骑士

兰陵县地处沂蒙山脉向苏北大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势北高南低，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夏季温热多雨，因此河流纵横，沟渠众多。古代，勤劳勇敢的兰陵人民，为了克服交通上的困难，架起了许多桥梁，既造福当世，又泽被后人。本文以粗陋之见，有限枚举，寻其根探其源，以表对那些古代桥梁修建者的敬仰之情。

**神山镇将军桥村将军桥。**建于隋末，民间传说为李世民麾下名将史大柰率领山东义军西进时所建（将军桥村东的罗庄区傅庄南面有山东义军的营寨旧址）。建成以后，历经千年风雨，多次修葺。桥头原来有清代所立重修记事石碑三通，可惜因村中人用来作了井沿，上面的文字大部分已磨掉，建桥修桥的原委就只好听凭传说了。该桥长约十米，宽约三米，石质多孔平梁式结构，现仍为连结将军桥村和新庄村的重要通道。桥的西头河坡上立有古代将军雕像一尊，高约一米六，身着戎装，背插令旗，手持铁板斧，虽经风吹雨打已模糊不清，但那英武之气依然呼之欲出。如果说这位将军是史大柰，倒不说他是程咬金，因为民间传说中的程咬金个头不高，再就是形容一个人开始做事时往往有“程咬金的三板斧”之说。据正史记载，程咬金是从山东起家的，史大柰则是少数民族的头领，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的重要支持者，史在山东的影响不如程的大，可能是《说唐》《响马传》等历史演义小说宣传的原因把他们二人混在一起了。

**庄坞镇庄坞村永济桥。**1916年《临沂县志》载：“城南九十里庄坞村，跨武水上，明弘治、正德年（公元1500年前后）间建。”永济桥主桥为石质平立梁式结构，南北走向，31孔，长约70米，宽约3.5米，桥面平时高出水面2米左右。有“名扬关东二百县，声传江南四十州”之美誉。永济桥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不论是农耕时代车水马龙的踏驰，还是工业时代巨型载重卡车的碾压，都没有撼动它沉稳刚健的躯体，现仍发挥着连结武河两岸交通的重要作用。



庄坞镇永济桥

**沂堂镇为儿桥村为儿桥。**约建于唐代（东为儿桥村内有植于唐代的古槐）。传说当时的燕子河东的孩子们要到西面的麒麟山村上学，因有河水相隔，来回很不便。一日，孩子们来到河边，看见陡涨的河水心中都犯了难，这时只见一鹤发童颜的白胡子老人迎上前来说，孩子们不要急，我驮你们过河。说完便将孩子一个个地驮到了河西岸，到了下午放学时，又是白胡子老人把他们驮到河东。老人说，我只是顺便帮你们忙，以后要是水大我还来驮你们，可这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哟。一连几天河水都很大，白胡子老人也就连着驮了几天孩子。可是孩子们天生好奇，没多久就把这事情说与家人，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高兴之余，拿着涮锅用的涮帚敲着锅台说，咳他娘的个头，俺儿有神仙保佑，俺还怕谁，那些对俺不济的人以后可得小心了。后来，燕子河又涨了水，大清早孩子们来到河边等着白胡子老人，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老人的影子，大人们听说后只好前来亲自把孩子驮到对岸去。放学后孩子们都回家向他们的父母要白胡子爷爷，白胡子爷爷要是在的话有多好，不要你们再为我们操心。当天夜里，那个孩子的妈妈在梦中遇见一个白胡子老者对她说，都是你道破了天机，坏了孩子们的好事。我是这一方灶王神，那几天看孩子们可怜，才帮他们过了河，可你却敲着我的头皮说了那么多不中听的话，我生你的气，再不帮你们了。谁知这位大嫂也是一个刚强脾气说干就干的人，听说老神仙不愿意帮忙，索性说，你不帮忙，俺自己想办法。第二天一大早，便走家串门，说服大家在燕子河上建座桥，一来为了孩子上学，二来也方便过往行人。经过一个冬春的苦干，一座小型石桥也就建起来了。人们为了记住这件事情，也就把村名叫了为儿桥。原来灶王神看到燕子河上没有桥梁，对谁都不便利，用了一个激将法，达到了他济世解难的目的。现在老桥旧址上建有钢筋混凝土的平板桥，仍是连结燕子河两岸的重要通道。

长城镇为女桥村为女桥，跨燕子河。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当时一徐姓富翁之女嫁到燕子河西，来回多有不便，为父爱女心切，遂在河上专建一桥为女儿通行。这真是无独有偶，燕子河上有为儿桥，下有为女桥，恰成“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最好明证。

**向城镇向城村北阳明桥。**明代宋鸣梧之曾祖父所建，因近年村落扩建，此桥周

围已是人家，惜已废弃，阳明河内尚余巨型条石依稀可辨。

**向城镇向城村淑济桥。**三孔，为拱型桥涵，长约20米，宽约5米，保存尚好，建于向城镇向城村南阳明河上。为明代宋日振（1916年《临沂县志》有他的传，传曰：以岁贡授莱州教谕，壬辰新城兵变，登郡失守。日振率士子亲临炮矢，保守莱城。升陕西平凉府通判，监纪宁夏，有战守功，迁同知，署府事愿军）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所建。1916年《临沂县志》有宋鸣梧《向城镇淑济桥碑记》篇专述。记中说桥有三孔，“高二丈尺而丰，其上漫石坚厚密致，践之碎碎，磴磴有声。（按：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旁则石栏，前象物而为之镇，望之尊尊，翼翼有威。（按：现已损毁）其两岸叠石各长百步，向之病涉者，恍然脱泥途而即康衢矣。”

向城镇陈桥村陈桥，又称城阳桥，约建于元代，因地处向城故城之南而得名，地当交通要道，是西泇河上与老鹤巷桥齐名的著名桥梁。现于旧址上修建的是陈桥水利枢纽工程，闸桥合一，闸的上方平湖荡漾，玉鉴初开；下方浪花飞溅，声传数里，为西泇河上的一大胜景。

**向城镇向城村升仙桥。**为佛教皇经会会员共同捐资修建，其中以女会员四姑娘功劳为最，她募捐化缘十数载，立誓在阳明河上建桥以造福众生，后终大功告成。此事迹有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建桥时所立功德碑记载。桥长约十五米，宽约三米，三孔，通身用巨型条石构组而成，三孔桥洞皆为拱型结构，在桥孔之间有用青石雕成的龙首（桥的北面）龙尾（桥的南面），惜毁于文革，西面一孔在抗日战争中为日寇飞机炸毁，战争结束后，村民自发出钱出工将其修复。现在大搞村村通工程，富起来的乡亲们又把桥面用水泥硬化，这古老的桥梁仍在默契地为阳明河东西两岸民众的交往提供便利。

**卞庄镇西小屯村兴隆桥。**跨东泇河，建于清代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现在其旧址建有新桥。

**大仲村镇大冶村大冶桥。**1916年《临沂县志》载：“在城南七十里，跨泇水，建于宋代，明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重修。”毁于1981年冬。从立于今新桥西头的巨型龟驮碑来看，应是皇帝下了圣旨，朝廷拨了专款所修。但由于设计和建造



大冶村古桥

们对大冶村的地质情况了解不深，对河流的规律把握不准，在桥建成后不久就成了观赏品。修桥的时候，东沭河沿大冶村所在南北岭西侧南流，河的西岸是松软的淤土，河的东岸是坚硬的岭石，同样的冲击力，西岸的消损速度远大于东岸。更何况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又会加大河水对河西岸的冲刷力。再加上桥西头并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年复一年，西岸离西头桥也就越来越远，渡河之人只好望桥兴叹。这是该桥被废被毁的主要原因。

**大仲村镇朗公寺红孩儿桥。**又称步仙桥，踏歌桥，元代重修朗公寺时所建，下有通慧泉常年不涸，为连结下寺与转经山的必经之路。

**大仲村镇金桥屯村京桥。**建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村中人给刚建成的桥梁命名为“京桥”，是希望京桥给村里人带来好运和吉祥，从此以后村中可以有显达之人在京为官，有了这座桥就可以直接与京城相联。后谐音为金桥，亦是金桥屯村村名的由来，现在旧址上建有新桥。

**大仲村镇永安村普济桥。**建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跨东沭河，旧为通往朗公寺的必经之路，现在旧址上建有新桥。

**层山镇小池头村方石桥。**约建于元代，跨小池头村东武河，整个桥身皆为巨型条石构成，是旧时郯城通往西北县境神山、磨山等地的必经之路。古时其下为洪水泛滥冲刷而成约数里的渊池，故河东有郯城县大池头村与小池头村对应，建村此深池上首，下有今二庙乡池口村是为此深池下首所在。

**南桥镇大桥村老鸪巷桥。**又称老鸪巷桥，原名中济桥。1916年《临沂县志》载：中济桥“在兰陵横山保，跨西沭河，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邑人任者泰倡募创修”。现在旧址上建有新桥，为郯夏公路的重要桥梁之一。

**贾庄乡官桥村官桥。**建于明代，后因年久失修，向城杭头村的宋梯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带头捐资重修，其孙宋鸣梧所写《重修官桥记》（见1916年所修《临沂县志·艺文志》）一文列举了修建官桥的原因：“向城于沂为形胜，北达青、莒，南爪徐、邳，行旅透纓，络绎不绝。其天市垣山，自岱、蒙辞楼而度，驰马从云，透丽数百里，遂蟠荒陬，碧流清泉，百泓环如星宿，达歇脚（按：今贾庄乡之铁角山）而南无壅断焉。国初，相原隰，广水利，置二屯（按：现在贾庄乡仍有孤山屯）其下，以便插荡而先视。上流总汇处，架石成梁，名曰官桥。”然“岁久浸湮，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我先人实倡修之。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雾土飞布，梁水高，轮路蹄而至者，泞不能前。傍岸禾黍，货诸鱼龙。汪汪千顷，眺之类三江五湖状。挈妻子而去走者，十家而五。”

**贾庄乡长新桥村长新桥。**位于村南宝带河上，建于明代，原桥屡修屡坏，在一次彻底的翻修后人们为祝愿新桥长新不坏，遂命名为长新桥。

# 抗战歌曲选—— 《反法西斯进行曲》

本 编



抗日胜利后，罗生特（前排右三）与山东军区卫生部同事在临沂教堂医院门口留影。

罗生特（1903—1952）犹太人，生于奥匈帝国的利沃夫。1923年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92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奥地利的犹太人遭到迫害，1939年罗生特从中国驻维也纳公使馆获得签证，得以逃离奥地利流亡到上海。1941年3月，罗生特离开上海来到新四军驻地盐城，成为第一个加入新四军的国际人士。1942年，他经钱俊瑞和陈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生特在新四军中被誉为“大鼻子神医”。1943年9月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生特跟随罗荣桓赴东北工作，担任东北野战军一纵卫生部长，在哈尔滨工作了三年。1949年，罗生特返回阔别10年的奥地利。1951年8月，罗生特前往以色列看望定居在那里的弟弟，第二年4月因心肌梗塞在以色列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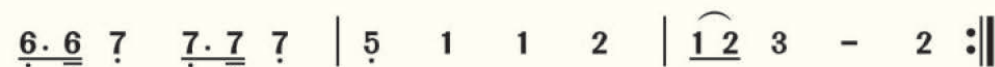
## 反法西斯进行曲

1=G  $\frac{4}{4}$ 郑野词  
罗生特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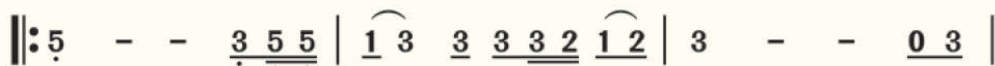
活泼有力

*f*

1. 前进前进，爬过山，翻过岭，一当十，百当千，  
2. 整齐队伍，咬紧牙，握紧枪，要和那，法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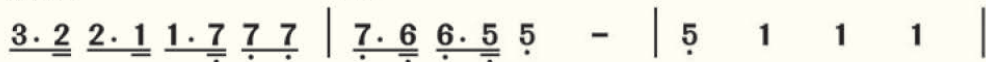
不怕死，不怕难，高唱战歌向前进！  
强盗们拼不场，不得胜利不丢枪。



听，被压迫人民在那里怒吼！要  
看，光明在面向我们招手，要

(稍快)

(慢)



挺起胸膛冲上前线，不要再彷徨，去把敌人  
团结勇敢奋斗牺牲，流血莫回头。胜利终属



消灭光！前进前进，爬过山，翻过岭，一当十，百当千，  
我们的。

(渐慢)



不怕死，不怕难，高唱战歌向前进！

# 沂水八景题咏汇编 (上)

党宝修

沂水八景一般指沂水古八景。沂水古八景即东皋晚照、岵山耸翠、望仙石桥、织女仙洞、龙池浸月、穆陵停雪、闵公书院、沂水拖蓝。沂水古八景邑人文士多所题咏，如明代进士杨光溥有《题沂阳八景》。杨光溥，字文卿，号沂川，明朝沂水县前杨家庄（今属莒县）人，明成化进士，累官至山西按察司副使，任满回籍，赠太中大夫，二品衔。杨光溥不但为官清廉，而且博学多才，著有《剪灯琐谈》《沂川文集》《梅花集咏》《杜诗集吟》《素封亭稿》等诗文集。

## 一、东皋晚照

“皋”是水边的高地，东皋山因地处沂河东岸而得名。据《沂水县志》记载，明天顺中期的沂水城，周围三里二十七步。清道光年间的县城，大约在今县城中心街以西、刘南宅步行街以北、莲旺街以东、县府后街以南的地方，面积只有现在城区的三十分之一。东皋旧称东皋山，俗称东岭，位于老沂水县城东面，该山南北走向，海拔170米。原来东皋山上建有玉皇阁、



东皋晚照



文昌阁、耶稣教堂、大小文峰塔等建筑物。当时东皋山上没有住户，满山松柏，四季常青。每当清明之日，太阳将落时，阳光经沂河反射到东皋山上，彩霞万道，飘忽闪烁，扑朔迷离，甚为美丽，故称“东皋晚照”。

东皋山志乘多有记载。康熙《沂水县志》卷一“山川”：“县东为东皋山，发脉自淮北，为一邑地气所钟，学官在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77-178《沂州府》：“东皋山：在沂水县东一里。”道光《沂水县志》：“爆山之东即锣鼓山，锣鼓山东南、县治之东为东皋山。学官在其西麓，又西即今县治，又西即沂水径流”，“马山（县城东北2.5公里）西南为东皋山。附郭之东，学官在其西麓。……山脉远自沂山，近自雪山，其别支为走马岭，逶迤南下，迭起迭伏，为沂莒分界。”东皋山西麓旧有学官（学校），明朝洪武年间由旧县治以东迁至东皋山西麓，设施齐备，规模宏大，清朝康熙年间多次重修。康熙《沂水县志》卷二“儒学”记载甚详：“沂水县儒学，旧在县治东，元末兵毁。明洪武十六年，徙于城东东皋山之麓。中为先师庙，东西两庑，前为戟门，东为名宦祠，西为乡贤祠，外为泮池。又前为棂星门，外为宰牲所，门前列牌坊二，庙后为明伦堂，东西为存诚、择善二斋，堂后为敬一亭。又东为启圣祠，祠后为教谕宅，其二训导宅。厥后兴废迭更，不可殫书，沿至明季颓废久矣。皇清开国之初，广励学官，革故鼎新焉。先师殿颓坏日久，教谕周之翰于顺治十五年重修。康熙七年地震，八年春，训导陈经纶修补焉。棂星门，七年地震塌毁无存。十一年春，训导陈经纶暨典史刘生鲲重建。明伦堂，地震毁坏。八年春，训导陈经纶重修。官舍自兵燹之后倒坏，不能蔽风雨，训导陈经纶捐俸修房十间。”嘉庆《重修一统志》第十一册《沂州府》亦有记载：“沂水县学，在县治东皋山麓。明洪武十六年改建，本朝康熙八年修，十一年重修，入学额数十二名。”传说古时候的东皋山，林木繁茂，山石嶙峋，满山松柏，少有人烟。野兽自由出没，百鸟结伴放歌。宋代李逵东皋杀虎的说法，已经在民间流传了多年。李逵回家携母去梁山，至此，老母口渴，李逵去沂河取水之时母遭虎食，李逵大怒之下力杀子母四虎，自此东皋声名远播。今已千余年过去，历经风雨荡涤，东皋之深暝已不可觅寻，唯一尊李逵杀虎雕像高耸在柏树掩映之下，栩栩如生。现在的东皋山1988年建成东皋公园，占地33.3公顷（约500余亩），是沂水城区的中心地带。

#### 题沂阳八景之东皋晚照（明·杨光溥）

晚坐东皋日已颓，余光红映碧云堆。海霞不雨林头出，野火无烟鸟外开。扶策送将诗客去，骑牛催出牧童来。明朝有酒真堪赏，不到黄昏不肯回。

#### 东皋即事（明·杨光溥）

红尘聊且避浮名，日日东皋醉复醒。寓目云山千里兴，绕城鸡犬万家声。溪边薄冻层层结，天际轻阴款款晴。见说望仙桥下景，不知赏业几时成。

#### 东皋独酌（杨光溥）

独上东皋日未曛，丹房只有半间云。山从城北峰腰断，水在村南燕尾分。有酒自应酬好景，无人谁复赏奇文。举头咫尺墙西外，黄鸟声声不住闻。

#### 东皋晚照（八景录一）（高淑曾）

林霞一抹胭脂湿，牛背横吹声转急。远山苍苍暮云平，欲落不落日光湿。此际间并入画图，看雁老翁藜杖扶。压树寒鸦飞不散，炊烟几缕滃茅庐。

#### 东皋晚照（祝植龄）

晚照祥光曳杖看，东皋胜地且盘桓。岵峰遮断斜阳景，沂水长拖暮霭寒。孤鹭飞翔霞散回，层城隐现雾收残。横山暗渡归来曲，一幅丹青画却难。

### 登东皋赋 邑人副使（杨光溥）

辛酉之春，三月既望，适春服以初成，当天气之和煦。有客顾予于素封之亭，于时，宿雨初晴，白云过户，顾瞻东皋，咫尺在目，草纷纷而兢茂，鸟嚶嚶而乱吟，绯桃绚锦，丹杏耀林，善万物之向荣，真可以快其目而娱其心也。杨子与客览平原之广漠，舒尘埃之怀抱，褰裳以被平蒙茸之间，飘裾以游于无倪之表，意油油以自适，发划然之长啸。于是借草为毡，有酒如泉，杨子乐甚。乃追栗里之游，载归来之篇，扬清歌于行云，幸尘鞅之早还。客乃正襟而问予曰：“此渊明愤世归来之吟，子何为取乐于斯人也？方今网罗才俊，丝粟罔遗，子胡浩然而归，指空山而长往，侣白石之离离，掩柴扉于断崖，嗟岁晏其栖迟，春杞菊以为粮，结草莽而为衣，兹人情之弗堪，胡夫子之自得？乃有怀于天地，举匏樽兮何适？”杨子曰：“子亦见夫出岫之云，归来之鸟，悠然而出者，吾不知其何为而出也，悠然而归者，吾不知其何为而归也，盖必有主宰其间者。夫人之出处何异，于是其出也奚以喜，其处也奚以悲。嗟夫，天地之数否泰相寻，万里之常，我安其命，回必不夺赐之福，蛮必不擅觴之强，则夫山中之寐寐，亦何愧夫轩冕之扬扬！”客悟而喜，遂扣壶而歌曰：“美人山中兮春复秋，桂树重生兮枝相樛，芝兰卓兮树丘，安得若人兮日与交游。”予亦和以伐木之诗，相与挥杯大醉，童子促归，不觉金乌西坠。

（康熙《沂水县志》卷六《艺文》）

## 二、岵山耸翠

岵山在沂水原县城南五公里处，有前后两岵山，沂河流经其西、南。岵山山体由石灰岩构成，因其为石山，周围系沂河冲积平原，势若拔地而起而得名。“岵”义即为石山，音八，但当地人读爬。

曾经的岵山林木繁郁，冬夏青翠，故称“岵山耸翠”。另一说法是因早晨雾重时，山上雾中带红翠色，故称。清道光《沂水县志》载：“山多乔木，有耸翠之意，为县八景之一。”清康熙《沂水县志》“山川”载：“县南十里为岵山，沂水经其下。”嘉庆《重修一统志·沂州府·山川》载：“岵山，在沂水县南十里。沂水经其下。”清道光《沂水县志》“山川”记载较详：“南十二里，自东皋而西为岵山。沂水经其南。岵山东麓为蝙蝠岭。岵山西北为荆山。山北麓即回龙庙岭。”今天所称的前岵山，又称东岵山，亦即志乘记载中的岵山，海拔240.3米。前岵山北



岵山耸翠

麓的漫岗称回龙庙岭，东麓为蝙蝠岭。今天的后岵山，又称西岵山，亦称郭山，俗称郭山子，志乘中称之为荆山，海拔214米。前岵山、后岵山，与沂河西岸的塔山，大体呈三足鼎立之势。

岵山耸翠曾经为沂水胜景之一，后此景逐渐湮没。清康熙《沂水县志》记载：“旧传山多桥（乔）木，有耸翠之名，为沂阳八景之一，而今亡矣。”可见那时就已胜景不再，后经战火洗涤，满山翠木破坏殆尽。如今山顶东面剩残墙一段，高约1.5米，杂草从中零星点缀些小松树，大多高不过1.5米。如今的岵山也已经成为沂水城区的一部分了。

清道光《沂水县志》还记载了一位岵山隐者的故事。康熙四十一年冬，卧石山人来沂，居岵山涧谷中。每卧石上，人问其姓氏里居，皆不语，袖中出笔砚，书于掌云：居山不必言家业，学道何须说姓名。或问君将安归？复书云：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他乡。时岁歉，督赈大臣来沂水，独步山中，赋诗以赠，并构木室居之。四十二年秋遁去。后数年，有识之者曰：君非向居岵山者耶？山人以手画地云：予岵山客，乾坤一野人。寻复去，不知所终。其与人唱和，自署卧石山人，遂以名之。

#### 题沂阳八景之岵山耸翠（明·杨光溥）

县郭南头路几重，两山隐隐列西东。云开螺髻高千丈，日出金莲掙半空。  
春雨更添无限绿，晚霞别助一般红。酒醒却忆行吟处，只在青青一抹中。

### 三、望仙石桥

望仙石桥在鞍子桥以西百米处，原刘南宅后墙外，后来的沂水县酒厂北院墙外。传说刘南宅的主人曾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相好，吕洞宾给刘家设计了八卦宅图样。八卦宅的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都有一对对称的门，生人入内往往迷路出不来。八卦宅建成后，吕洞宾就走了，临行对刘家说，如想念他，站在桥上西望，即可望见他。故称“望仙石桥”。

#### 题沂阳八景之望仙石桥（明·杨光溥）

仙人一去几千秋，偃月空中水自流。丹就不须青鸟约，身轻直驾白云游。  
风飘环佩历回首，人倚栏杆尽举头。我到当时还跨鹤，腰缠十万下扬州。

### 四、织女仙洞

织女仙洞在今沂源县东里店以西约10公里处。仙洞在沂河南岸的半山腰里，洞内塑有织女神像，洞对面沂河北岸有一村叫牛郎官庄，还有牛郎庙，如牛郎织女隔天河。此地树木茂密，为自然风景区。

#### 题沂阳八景之织女仙洞（明·杨光溥）

金梭晓夜为谁忙，隔水桃花满洞香。万国尽沾尧雨露，九重欲补舜衣裳。  
绮罗光映云霞重，机杼声抛日月长。却笑天台有仙子，此生谁解忆刘郎！

#### 登织女台（王松亭）

高盘石磴赴仙关，洞口如逢列宿还。仿佛星河垂碧落，依稀牛女降人间。  
纵知机杼此中有，那信鹊桥渡后闲。我欲乘槎谁接引，客星高听水潺潺。  
天孙台上望仙楼，危槛平临景物幽。山径南随林麓转，沂河东折古今流。  
泉溪声急晴疑雨，松柏风寒夏亦秋。但于此间得少趣，寻源何事问牵牛。



织女仙洞

## 五、龙池浸月

龙池在沂水县城西原沂河木桥（木桥在上世纪80年代拆除）西头北边。所谓龙池，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渰子，据说沂河龙王即住此渰内。清代，每月十五，月明风清之夜，一轮明月映照池内，两月相照，故称“龙池浸月”。关于龙池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清朝一位知县携眷来沂水赴任。有一天夜晚，知县的少爷独自一人来欣赏“龙池浸月”，流连忘返。夜深时，从渰子里走出一美女，自称是沂河龙王的女儿，与少爷有姻缘之份，龙女用手向渰中一指，渰中水分两边，闪出一条道路。少爷随龙女进入龙宫成亲。少爷夜出不归，急坏了知县老爷，派人四处寻找不见，三天后少爷自行回家。这位少爷向其父述说了遇龙女之事。知县听罢大怒，并亲自写一篇书文，斥责沂河龙王家教不严，纵女行邪，败坏神风，将书文焚化投入渊中。又下令收买石灰堆放池边，凑足数万斤后即投入池内。是夜龙王托梦与知县，自责家教有失，且说小女与少爷确有姻缘之数，劝知县莫向池内下石灰，即刻搬迁云云。天明后，派人探视，龙池已被沙淤平，从此龙池浸月一景亦随之湮没。传说沂河龙王搬家到苗家曲（今属沂南县）一深渰里去了。清道光年间修的《沂水县志》载：“龙池，县西，为八景之一，今湮。”这也说明清道光年间，此景已湮没。

### 题沂阳八景之龙池浸月（明·杨光溥）

百尺清泉浸太阴，等闲风月有龙吟。汉妃置酒银盘漾，湘女凌波宝镜沉。  
半顷琼田呈白璧，一炉丹汞点黄金。枕边不耐清吟聒，应共蟾蜍说素心。

### 沂水形势（明·杨光溥）

南来一水傍城流，十里封疆接莒州。桃涧春浓苍似锦，龙池夜静水如钩。  
士沾鲁俗还逢掖，地坐齐风不起楼。莫讶文风千古盛，沂山西畔是尼丘。

## 巾幗铁流 (六)

海 涛 高 雷 国 英



前排左一为王辩

王辩（1906—1987），字惠琴，又名黄秀珍，化名宫琦。山东诸城人。1920年考入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1年参加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唯一的女会员，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团学生部主任，宣传部、妇女部部长，国民党济南地方临时党部主要负责人和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党部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毕业后到济南竞进女校任教。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后被捕入狱。1930年夏出狱后，被党组织派往沈阳、哈尔滨、安东、穆陵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又回到山东。先后任《沂蒙导报》记者、中共沂南县委宣传部干事、省妇联儿童保育部部长。建国后，任北京图书馆苏联图书室主任。

刘静（1922—2007）原名刘亚梅，陕西省神木县沙峁人。1936年12月参加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任宣传员。不久与独立师师长王兆相结婚。后任神府特委妇联副主任。1940年与丈夫王兆相一起进入沂蒙山敌后抗日前线，历任鲁中军区二分区司令部机关代理指导员，支部书记。反扫荡中负伤，伤愈后任鲁中行署卫生学校学员队队长、清河军区野战医院二所护士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六纵十八师司药长。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招待所党支部书记。



红军时期的刘静（左二）与丈夫王兆相（左四）在一起



1942年冬，范琳与张国峰结婚合影

范琳（1914—1972）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泰安女子师范毕业，著名爱国老人范明枢的孙女。抗战爆发，范老携全家参加了救亡运动，范琳自幼父母双亡，靠爷爷范明枢把她抚养成人。为挽救民族兴亡，范琳放弃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徂徕山起义，成为当时“十名女战士”之一。1942年冬天，时任中共泰安特委妇委会秘书的范琳与时任泰南专署公安局长的张国峰结婚。建国后范琳曾任济南市儿童医院书记。文革中任山东公安厅长的张国峰被迫害致死，此后几年，范琳和大女儿（抗战时期蒙阴坦埠出生）因病相继去世。



抗美援朝前夕，石李氏（二排右首）与女婿庞世泽（后排左一）女儿石健（后排右一）合影

石李氏（？—1973）临沂县重沟乡石家村人，一门三英的母亲，其子石金鼎（中共苍马办事处石埠乡民主乡长），石金芝（中共苍马工委军事部长），石金铎（中共滕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后为国捐躯。在丈夫去世后，为躲避鬼子迫害，石李氏带领着老少三辈、孤儿寡母十五口人流浪外乡。当抗战胜利传到家乡时，石李氏方才知三个儿子早已壮烈牺牲，她没流一滴眼泪。



张恺（1918—2015），化名王世荣，出生于辽宁省营口。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先后任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团员，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三大队四中队指导员。8月，调国民党费县保安二旅搞统战工作，以爱国青年身份出任训练队教员，被授予国民党军队中尉军衔。1939年5月调山东分局战时服务团任党支部书记。

1939年秋至1941年初，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党校、鲁南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1941年初至1950年夏，先后任鲁南、鲁中南区党委妇委书记、妇联主任。建国后，任山东省妇联秘书长。山东妇联第三届执委会副主席。山东妇联第五届执委会主席。后任省委委员，妇委书记，济宁市委第一书记，济宁地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张恺（右）与丈夫穆林（左）在鲁南徐庄镇土山村



1943年2月5日，丁秋生与高波在沂南县孙祖村结婚时留影

高波（1920—？）山东邹平人。丁秋生中将夫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曾任山东军区后勤部直属部队指导员，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青岛市委机关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办公厅干部科科长。

# 姓氏百家漫谈——徐姓 (下)

赵丹峰

唐、宋时期，一批徐姓贤达在文化领域颇有建树。其中在文史方面成就斐然者有：徐凝，唐代著名诗人。年轻时到京城长安求取功名未果，失意之际先后结识白居易、元稹，其诗作受到两位大诗人的称赏，徐凝为此吟出了“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的诗句，以表达知遇之慨。徐凝诗以七绝见长，风格简古疏隽。《忆扬州》为其代表作：“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此诗被公认为是歌咏扬州这一繁华运河之都的佳作，尤其是后两句，更是被广为传诵，成为描写古扬州明月之夜旖旎风貌的传神之笔，与其后杜牧在《寄扬州韩绰判官》中所吟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铉、徐锴兄弟，五代宋初著名的文字学家。徐铉初仕南唐，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因与其弟徐锴系文字学大师，时号大小二徐。铉为兄，世称大徐；锴为弟，世称小徐。徐铉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解字》。在校订过程中，徐铉改正了一些传写讹误，辨正别字俗字。此外还为《说文》新补19字，又将经典中常见而《说文》未载的402字附于正文各部首之后，世称“大徐本”。公元982年秋，他和李昉、扈蒙等人奉宋太宗之命，广搜前代名家诗、文，尔后择选精华，分为37类进行编纂，4年后成书付梓，名为《文苑英华》。该书共1000卷，上承《昭明文选》，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诗、文，是中国古代又一部极为宏富的诗文总集。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一起被总称为宋代“四大书”。徐锴系徐铉弟，官内史舍人。他精通文字训诂学，撰著《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该书系《说文》的第一种注本，作者在书中除引据古籍证明《说文》的本义外，还指出其他引申之义，且依据声符说明形声字的字义与声符的关系，开中国文字训诂学因声求义法之先河。为便于检索《说文》，徐锴又撰《说文解字韵谱》5卷。



徐照（字灵晖）和徐玠（号灵渊）系南宋名诗人，因徐照、徐玠和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个人的字、号中皆有一个“灵”字，且皆成长于永嘉（今浙江省温州），故时人与后世将其四人合称为“永嘉四灵”。徐照终生为布衣，提倡清瘦野逸的诗风，是“永嘉四灵”中首先反对江西诗派而倡导晚唐诗风的诗人。主要以写近体诗为主，写作时刻意炼字琢句，题材亦较显狭窄。徐玠诗风与徐照相似，善在韵律与单字上用力。亦有清新高朗和关心农事之作，《新春喜雨》诗即属此列：“农家不厌一冬晴，岁事春来渐有形。昨夜新雷催好雨，蔬畦麦陇最先青。”

徐梦莘系南宋著名史学家，绍兴年间进士。他有感于靖康之乱，遂发愤研究宋、金和战历史，于绍熙五年（1194年）撰成《三朝北盟会编》。该书总250卷，记述内容上自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下止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对其间宋、辽、金三朝交涉与和战的历史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记述。该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各种史料全录原文，“其辞则因原本之旧，其事则集诸家之说”，既不随意取舍，亦不妄加褒贬，以备当时与后世史家采择佐照。由于他的这一治史原则，终使所征引的200余种史籍，得以保存了原貌。这些史料涵盖了宋、辽、金三朝军事、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在艺术领域，徐熙、徐崇嗣祖孙二人相继名噪当时画苑。徐熙系五代时南唐开创一代流派的画苑宗师。徐熙一生不求功名仕途，以高雅自任。作画题材以江湖间汀花水鸟、鱼虫蔬果为主。他常游园圃，仔细观察各种动植物的情状、特点，所作禽鸟，形骨清秀。独创“落墨”法，一改细笔勾勒填彩晕染的传统画法，而采用粗笔浓墨，草写花卉，略施杂彩，色不碍墨，不掩笔迹，与后蜀黄荃多画宫中异卉珍禽且格调富丽的画风迥然异趣，故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评。二者作为五代末初中国花鸟画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并称“黄徐”。米芾十分推崇徐熙的画作，曾评价道：“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黄荃唯莲差胜，虽富艳皆俗。”徐崇嗣系徐熙之孙。北宋著名画家。创作题材与其祖父相同。初承家学，因不合当时画院黄氏门派的程式与风尚，便改效黄荃、黄居寀父子，后自创新体，自成一家。作画时不用墨笔勾勒，直接以彩色晕染，收“叠色渍染”之奇效，被称为“没骨图”，亦叫“没骨花”，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兄徐崇勋、弟徐崇矩亦是名显画苑的丹青高手。

明、清两代，徐姓所出名人甚多，其中在军政领域的徐姓名人主要有：徐达，明初著名军事家、开国元勋。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与明太祖朱元璋同邑。徐达虽出身世代业农之家，但他少怀壮志，刚毅勇武。从22岁起即追随朱元璋，浴血奋战，屡建功勋。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他率军饮马长江，跨越天堑，一举攻占集庆（今南京），与常遇春同为深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的三军锋冠。朱元璋占集



徐熙《雪竹图》局部

庆后，即改称为应天府，将这一六朝古都作为其大本营和指挥中枢，遂开始了对陈友谅、张士诚等江南地区割据势力的攻伐。为实现朱元璋的这一战略目标，身为大将的徐达，连年率军作战，屡败张士诚和陈友谅：至正二十年、二十三年，两次大败陈友谅。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被灭。翌年，朱元璋称吴王，任徐达为左相国，相继平淮南、淮北。二十六年，徐达被拜为大将军，率师20万伐张士诚，攻占湖、杭二州。吴元年（1367年）徐达力破平江（今江苏苏州市），擒张士诚，从而铲除了江南地区最后一大割据集团。徐达亦因立此大功而被封为信国公。此后，朱元璋展开了与元朝统治者争夺全国政权的北伐战争。是年十月，徐达被拜为征虏大将军，率劲旅25万，北伐中原。徐达和常遇春（为副将军）根据朱元璋确立的“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的战略部署，率军由淮入河，鼓行而东。明军攻取山东的第一座城池是沂州（今山东临沂市）。沂州守将王宣、王信父子先降而后再叛，被徐达一举削平。沂州乃山东门户，素有“齐鲁锁钥”之称。沂州既克，大势已定，益都、般阳、东平、济南、济宁等地守将见状亦相继投降，至1367年底，徐达便尽占山东全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徐达被拜为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三月，徐达率师抵汴梁，元守将惧其声威不战而降。从此，攻取元朝京城大都已成为明军的首要作战任务。闰七月，徐达率军操戈北上，连破长芦、直沽、通州。元顺帝见大势已去，便带太子、诸妃仓皇出京，北逃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初二，徐达率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宣告了元朝统治的灭亡。随后，徐达又率军先后收复山西和陕西。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奉命北上击败扩廓帖木儿，班师回朝后，被任为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改封魏国公。徐达智勇兼备，治军严明，行大仁义，不妄杀戮，深得军民爱戴，故所战多捷，功勋卓著，被誉为大明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病卒后，明太祖追封其为中山王，谥武宁。

在政坛上，徐阶是一位身跨嘉靖、隆庆两朝的重臣。徐阶系嘉靖二年（1523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晋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期，任内阁首辅的严嵩与其子严世蕃独揽朝政，权倾一时。徐阶在内阁与其相处，为避其加害，十年间倍加小心，谨慎从事，以待时机。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起，明世宗对严嵩的擅权渐有察觉，转而信任徐阶。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在徐阶授意下，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收受贿赂、卖官鬻爵、霸占民田等诸种恶行，奏请罢免严嵩，斩杀严世蕃。其他大臣亦随即纷纷上疏，列举严氏父子的罪行。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严世蕃被依法处斩，严嵩亦被罢黜为民，寄食墓舍。徐阶扳倒严嵩后，被任为内阁首辅（即事实上的宰相）。徐阶拜相后，力革弊政，宽政轻刑，谏止滥杀大臣。执政期间，对有才干者多能举荐提拔，使高拱、张居正等得以入阁参与机要国政。对耿介之臣，亦多加保护。如嘉靖四十四年，时任户部主事的海瑞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冒死向世宗上了《治安疏》，以激切的言辞，指斥世宗君道不正，致使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此疏被后人誉为“直言天下第一疏”。因海瑞的奏疏击中世宗的弊政要害，世宗阅后大怒，下旨将其下狱。刑部欲治其死罪，徐阶感佩其忧国忧民不惜犯上招祸的壮举，遂冒着风险将刑部送呈的奏疏截留，救海瑞免于死。世宗死后，徐阶代拟遗诏，遗诏以世宗自责的口吻，道出了朝廷积弊：“祷词日举，土木岁



徐达画像

兴，郊庙不亲，朝讲久废。既违成宪，亦负初心。”又称：“自继位至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在系者即先释放复职。方士人等，论厥情罪，各正典刑。斋醮工作采办诸劳民事，即行停止。”徐阶抓住新皇登基的有利时机，通过自拟帝王遗诏的形式，既指出了嘉靖末年的弊政，又提出了纠错反正的举措，实际上是他推行新政革新的一篇施政纲领。遗诏颁布后，新即位的穆宗遵遗诏实行，一时间，朝野气象为之一新，以至人心舒畅，吏民称誉。徐阶的上述突出建树，受到了时人与后世的高度定评，史家依此将其列为贤相，悉载史册。

此期，在科技、文化领域，徐姓族中不乏成就斐然者：徐光启系晚明重臣、中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步入仕途。崇祯五年（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内阁）大学士，是年卒于任上。徐光启的名字之所以能常留于历史和国人心中，并非仅在于他是官至一品的内阁宰辅，而是因为他毕其一生精力，在勤于国政的同事，在科技领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宰相科学大师。徐光启研究范围甚广，涉数学、农学、天文学、军事学、人口学诸学科，尤以数学、农学和天文学所取成就最大。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广东教书时与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相识，从其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决意将这些先进的科技知识介绍给国人，以实现其科技强国的抱负。他首先与利玛窦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6卷，译文精确简练，全部数学名词皆系首创，其中大部分至今仍在沿用。又译《测量法义》《简平仪说》《泰西水法》等。这些译著开西洋科技输入中国之先河。他会通中西历法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奠定了中国近300年的历法之基。在农业方面，徐光启着力最勤，编撰《农政全书》是他在农业方面所取得的一项重要科技研究成果。该书共60卷，60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等12门。该书辑古代农书凡229种，在对这些文献加以记载的同时，辅以作者本人的经历和述评，使读者深受启迪。书中极重水利，以能否灌溉作为区分成田和荒田的



徐光启与利玛窦

标志，指出中国农业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水利不修”所致。明代，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作物经南洋由美洲传入中国，徐光启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有关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方法，对促进当时与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政全书》作为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之大成的著作，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在人口学方面，徐光启第一个提出了人口倍增的时间间距学。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人口大约经过30年增加一倍。这一理论与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每25年即可增长一倍的论断十分相近，且提出的时间比马尔萨斯说早了170年。在军事方面，徐光启撰著了《兵事或问》，并亲自练兵，研制改进火器，为击退后金的进犯作出了贡献。徐光启生于上海，卒后又葬于故土，上海人民为有这样一位先贤倍感荣耀。徐光启去世后，其后裔为守墓祭祀之便，便在其墓地附近居住繁衍，此处遂成为徐姓族群的一个重要聚居地。因此地位于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交汇处，人们便称此地为“徐家汇”，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标志性地名。后上海市在此设徐汇区，区政府即驻于此。如今，这里已成为上海市区西南部的文化与商业中心。



徐渭《墨葡萄图》

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作为剧作家，徐渭创作了《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狂鼓史渔阳三弄》《女状元辞凰得凤》（总题为《四声猿》），是明代杂剧中出类拔萃的佳作。汤显祖曾赞道：“《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遍。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袁宏道则称之：“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在谈其文艺创作成就时，徐渭自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但后人则多认为其绘画成就最高。作为明代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徐渭与别号白阳山人的陈复道齐名，并称“青藤白阳”（徐渭号青藤道士）。徐渭擅画山水、人物，尤于水墨写意花鸟画最为入称道。他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诸种手法，挥毫泼墨、随意点染，其画作气势豪放，充满了酣畅淋漓的激情，充分表达了他孤傲不群的鲜明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徐渭作画时常题诗于上，诗画搭配，既提高了画作的文化品位，又点明升华了创作主题。如他在《墨葡萄图轴》上题诗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诗画相融，是作者愤世嫉俗、直抒胸中恨懣的真实写照。由于徐渭潇洒豪放、泼辣恣肆的画风，打破了明代画苑陈陈相因的积习，使其在明代画苑中占有承前启后、自创一格的重要地位，对后世影响极大，郑板桥、齐白石、黄宾鸿等绘画大师均是受其画风熏陶，然后大胆创新自成一家的。

此期的徐姓文化名人还有：

徐祯卿系明代著名文学家。徐祯卿少有才情，与唐寅、祝允明、文徵明齐名，称“吴中四子”。后与李梦阳等并称“前七子”。撰《谈艺录》，论诗主情致，重情贵实。其诗风格清朗，《猛虎行》《苦寒行》等诗指陈时事，隐喻讽刺。徐渭系明代集文学、杂剧和书画创作于一身的著名文学艺术大师。他幼孤聪敏，却屡应乡试而不中。中年为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幕客，对抗倭军务多献策划之计。胡得罪下狱，他受牵连而致惊狂，愤而自杀未遂，竟误杀其妻，下狱七载。出狱后贫病交加，靠卖书画谋生，后郁愤而歿。作为文学家，其诗歌、文章皆奇恣纵肆，一些重大事件，如抗倭战争和反严嵩斗争等，均在其诗文中有所反映。《龔山凯歌》即是其记述抗倭战争史实的诸多诗文中的一首代表性诗作。作者以凝练苍劲的笔触，对明军剿灭藏匿于龔山倭寇的惨烈战事，作了十分形象的记述，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

徐霞客系明代著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后以号行。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了大量地方志书（含图经、地志等），对探索自然地理奥妙产生了浓厚兴趣。从22岁起即开始了其旅行生涯，历时30年，足迹北至晋、冀，南涉粤、桂、滇、黔共16省，艰辛备尝，矢志不渝。早期以登山览胜为主，晚年将其主要精力用于系统的地理考察与研究。著有《江源考》和《盘江考》，主修了《鸡足山志》。徐霞客的最大贡献，是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内容宏富的日记体巨著《徐霞客游记》。该书本为徐霞客的野外考察日记，其病逝后由季梦良和王忠纫整理成书。该书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均作了详细记录，开辟了中国地理学界系统观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如徐霞客在书中提出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说；元江、澜沧江、潞江等各自入海，并非长江支流等，从而纠正了《禹贡》以至《明一统志》中的记述错误。再如书中详尽记载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地貌，既拟定了喀斯特地貌的类型与名称，又指出了该地貌的地区差异与成因，是世界上最早记述、研究喀斯特地貌的珍贵文献，比欧洲人对此问题的关注研究早了一个多世纪。此外，《游记》还对喷泉、地热、植物生态、动物地理、气象以及西南边区的社会经济、历史地理、民族、民俗亦作了详实的记述。该书文笔生动，可读性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

徐乾学系清代著名学者。康熙九年（1670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他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史志编修方面。由于他学识渊博，颇受清圣祖康熙帝倚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奉命编修《明史》，任总裁官。康熙二十四年入内阁后，又任《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康熙二十七年，因受湖广巡抚贪污案牵连被解职，但仍领国史、一统志总裁之责。翌年，都察院副都御史许三礼劾其与少詹事高士奇结党营私、徇庇子侄，他上疏加以辩白，而后请乞去职归里。圣祖准其回归故乡江苏昆山，并可带原修志局人等，在家继续统编《大清一统志》。在编修《大清一统志》的同时，徐乾学邀集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名家编撰成《资治通鉴后编》。该书计184卷，为编年体史书，纪事起于宋，止于元。后，乾隆时的状元毕沅以徐本为底本，增补新出史料，重加修订，成《续资治通鉴》220卷，成为中国古代一部颇具代表性的著名史书。此外，他还搜集唐宋元明历朝解经典籍，汇为《通志堂经解》；又集历代丧制，加以说明，编成《读礼通考》。其弟秉义、元文皆显名于当时政界、文坛，并称为“昆山三徐”。其中徐元文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进士第一名（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掌翰林院事。康熙十八年起，充任《明史》总裁官长达三年。徐乾学兄弟学识广博，尤其在史志编修方面颇有建树。但由于为官不够清廉，且对子侄管束不严，故在朝中和乡里多有积怨，为人诟病。

（未完待续）

# 国粹之星

——访张志发

刘凤才

目睹张志发之形象神采，气质敦厚，温和谦逊。耳闻张志发之浅谈深论，更觉得其亦通国学，底蕴丰富，金石之言，掷地有声。中医作为我国的四大国粹（中医、书画、京剧、武术，一说烹饪）之一，就其历史资历与实用价值，堪称国粹之首。张志发作为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暨首席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暨博士生导师，省、市名中医药专家，省中医肾病、肝胆病、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市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又曾荣获山东省首届优秀青年中医、“沂蒙长青奖”“临沂市十大杰出医师”等荣誉，完全称得上是升起在沂蒙大地，闪耀于中医国粹银汉中的一颗明星。

张志发说：我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我的理想就是用中医为病人解除痛苦。“医生”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才最珍贵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无愧于“医生”二字，其余的都不重要。



## “良驹”立志承家传

张志发1954年生于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乡后城西村一个中医世家，属马，从小就透着一股“骥”之风。他的爷爷原是本地的私塾先生，学富五车，育人有方，名气很大，威望甚高。但是，老人后来却神话般变成了名望更大的中医先生。缘起是“老百姓看个病太难”。有一次，张志发的曾祖母突然身患疾病，卧床不起。爷爷不敢稍有怠慢，十万火急地去请当地一位有点名气的郎中，结果三顾其门，先步行请，后推车请，再牵驴请，竟然都没有请得动，险些误了病情，幸亏老奶奶福大命大造化大，度过了一关。然而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爷爷，竟然坚决放下“四书五经”不教，从头学起了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与《本草》。爷爷坚信“有志者事竟成”，再加上学问底子厚，悟情过人，不久就弄懂了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知道了病因中的外感内伤，掌握了八纲、六经、脏腑、卫气营血辩证等基本医理；学会了望、闻、问、切各种诊法；掌握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各种治则。每当有郎中给其他病人看病时，他还默默地在一旁静观凝思，心揣手摩，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几年，爷爷就可以独立行医了；老人又特别肯于钻研，善于积累经验，后来在治疗肝硬化腹水、肾病、妇科病等疑难杂症上，创造了许多的“独门绝技”，效如桴鼓，名扬四乡，连临邳苍一带的许多患者也慕名而来拜医求药。后来，张志发的父亲承父业，加之为人忠厚，仁心妙手，颇有成就。爷儿俩一个在白沙埠乡医院，一个在李官乡医院，同心戮力，治病救人。而张志发的母亲，身上几乎具有中国妇女的所有美德。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特别勤劳吃苦又仁慈善良，无论对家中所有老小，还是对四邻八舍，都能和睦相处，和合一片。宁愿自己吃不上，也要别人吃得上；宁愿自己少吃点，也要让别人吃饱吃好。因此，张家这个杏林之家，在乡亲们中口碑甚佳。

1967年，13岁的张志发尚未上完“完小”，“文革”就蛮不讲理地剥夺了他的求学权利——“停课闹革命”。孩子没有学问岂不成了荒废的一代？满腹学识的爷爷倒是早就看出这个属马的孙儿聪颖伶俐、知书达礼，是个好苗子，用心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匹“千里马”，于是主动地当起了“伯乐”：“反正没学上了，干脆跟爷爷学中医吧！”

张志发喜出望外：这正是他的梦想！他从小就对爷爷充满了无限崇拜。看着爷爷那么大学问，看着那么多病人怀着虔诚的表情来找爷爷看病，又看着那么多被爷爷治好的人对爷爷的真诚感激，他觉得爷爷太高尚伟大了。爷爷要收他为徒，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暗下决心：爷爷这么看得中我，我决不能给爷爷丢脸，一定要把爷爷的本事学到手，将来当个像他那样的好医生！

爷爷给他启蒙的第一课，是交给张志发一本《药性赋》，让他吟诵于口，熟记在心。这样的内容，对一个13岁的男孩子讲，实在是陌生艰涩而枯燥乏味，但他在爷爷的严厉要下，还是用心地反复吟诵与默背着药书，不出一月，就把200多味中草药的药名药理，背得滚瓜烂熟，甚得爷爷欢心。

翌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张志发上了几年中学。高中毕业后，爷爷又让张志发继续跟着学医，村里还选用他做了赤脚医生，给了他一个小小舞台。此时，随着年龄与文化的增长，张志发的“学历”提升了一个档次，爷爷让他上台对照方子抓药，并开始精心地教他如何诊病治病。他不但刻苦钻研，还十分有悟性。有一天，爷爷不在家，来了一位病人。张志发请他等爷爷回来后给他诊治，但是病人对张志发却十分相信，说：你给看看，抓点药就行。张志发用望闻问切诊断了他的病

情，用爷爷治此种病时常用的一剂处方并做了些加减，给他抓了3副药。头天过去，张志发不放心，专门赶到病人家询问，回答说好点了。两天过去，他又去问，回答说好多了。第三天过去，病人高兴地说，全好了！这使张志发大受鼓舞，信心大增，开始用中医药给乡亲们治疗一些常见病，每每看到成效，他更加激发了一分自豪与自信。

动乱渐衰，曙光初现。作为世家之后、赤脚医生的他，又有了3年的学医经历，张志发以独具而全面的优势条件，得到上下一致推荐，进入了山东中医学院，这是全省中医学的最高学府，全家如过节一样高兴。进入学校，张志发眼界大开，精神大振。他牢记着爷爷、爸爸的重托，牢记着缺医少药的乡亲们的期待，珍惜每一分钟每一节课，全面扎实、刻苦钻研着所有的基础知识。他智商高，又有着从小从爷爷那里学来的知识，有着几年的学医经历，学习对他来说，即便不是举重若轻，也可以是驾轻就熟。但他绝无懈怠之意，更无满足之心，他在心中已经给自己制定了更高的目标：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这个中医世家的“第三代传人”，今后不但要当好家业传承者，还要当好华夏国粹、祖国医学的传承人！

1978年，毕业考试。三年寒窗，梅开此时。在全校14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张志发一枝独秀，名列前茅。当时院里希望他留校任教，但他牢记着自己的家乡，时刻惦记着乡亲们缺医少药的状况，婉言谢绝了恩师的美意，毅然回到临沂。

爷爷当年看中的这匹“良驹”，终于可以在传承家业、振兴国粹的道路上，在“千里马”的人生旅途上，振鬣驰骋，大展前程了。

### 仁心育出“半枝莲化淤排石汤”

毕业后的张志发，本欲被分配到地区中医院，集中精力从事一个专业，这肯定有利于他的事业。由于种种原因，他被分配到地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他虽然觉得有些不尽如人意，但是，当地区医院人事科的领导乘着当时只有院领导才能坐的吉普车专程赶到汽车站迎接时，他被医院领导求贤若渴的精神深深感动，二话没说上了车。

当时医院中医科技术力量雄厚，有袁正瑶、姚子扬、余益礼等知名中医专家。院领导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激励他：“小伙子，在这里好好干5年！”虽然当时的条件有点简陋，但是当有人问他是否后悔没留在省城任教时，他坦诚地说，真的没有。因为从用自己的知识开始给父老乡亲看病起，当他看到经自己之手解除了病痛的患者那种高兴与轻松，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情，这种愉悦是任何其他快乐都无法比拟的。

他没有辜负领导与前辈的期望。毕业只几年时间，在他尚不足而立之年时，就成功地攻克了一个医疗难题，并破天荒地创造了地区人民医院历史上的第一个科研项目，争取了第一笔专项科研经费。

沂蒙山区素以“青山绿水”引为自豪。但或许是造物主对人们总是要保持一点儿平衡，当时泌尿系结石症成了临沂一种多发病。临沭县白旄乡一家兄弟4人罹患此病的竟然有3人，河东区一个村庄更是多人患尿结石病。上世纪80年代，无论诊断手段或者治疗技术，都远远落后于今天。结石病人重者只有动手术，病情轻者西医又无有效而简便的方法，许多患者便来到中医科求治。面对痛苦的患者，医生的强烈责任感让年轻的张志发萌生了用中医药攻坚克难的决心。他从多方面深入分析研究结石形成的病理原因，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在上百味中草药中，一味一味地细致入微地考量着其药理功效，最后选定了“半枝莲”作为“君药”。此药具清热解



毒、活血祛瘀、消肿止痛、止血利尿、抗癌等多种功能。在此基础上，他反复地实验组合处方，创造发明了“半枝莲化瘀排石汤”。

疗效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在不长时间内，张志发以此汤药先后治愈了32例患者，将结石顺利排出。更让他惊喜的是，有的患者竟然完全溶化了结石！然而患者一旦病愈，一般不再来复诊。为了解药效和治疗情况，他常常不辞辛苦，直接赶到患者家中。有一次，为回访沂南双堠一位患者，他先乘坐几十公里的长途车到乡镇，又骑着租来的自行车跑了十几里，才找到患者家。

张志发更在本科领导与前辈那里获得了充分肯定、信任与支持。老主任的儿子也患有此症，专门委托他以此汤药给予治疗。结果只服了40副药，就神奇地将结石化为乌有。

1982年，省中医药院一位专家到临沂地区进行学术报告与交流，介绍其用自己发明的中药治疗泌尿系结石，当时取得了8例成功，而此时张志发已经治愈30多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疗效是衡量处方的唯一证明。考虑到还有那么多患者经受着疾患的折磨，何不把自己的成果推广开来，为更多的患者造福消难？于是，张志发带上治疗资料，专程赶到自己的母校山东中医学院，找到党委书记张奇文教授汇报。书记一看，当下大喜，十分肯定地说：这已经是科技成果了，可以立项拨款，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让张志发更没想到的是，学院领导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第二天就帮着落实，不久省卫生厅就同意立项，并拨专款用于该项目研发。最后，“半枝莲化瘀排石汤治疗泌尿系结石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省卫生厅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8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临沂当然没有幸免于难。当时在市院查出因服此类奶粉患结石的儿童达数千例。问题很严重，院领导很重视，亲自召集专家委员会研究治疗方案。尽管当时碎石技术已经很发达，但儿童不能行碎石治疗。张志发站起来，信心十足地说：“用中药，服半枝莲化瘀排石汤，不但有排石的作用，还有溶石的功效，减半量服用。”结果，所有患儿的结石均溶石治愈。

张志发在治疗疑难杂症上，也多有独到之处。

他的一位徒弟有位亲戚，前些年患了白血病，家里人都不抱希望了，想起在医院工作的亲戚，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至中医科，徒弟请张老师予以诊治。患者亲属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只是想能多拖一天是一天”，没想到服了张主任开的药，两个月后病情竟然明显好转，并一直保持到现在。

沂南县青驼镇一位刘姓中年女职工，长期饱受慢性肾病的困扰，曾四处奔波，求治于济南、青岛的许多家大医院，也曾在四邻八乡到处寻求民间验方，都是失望而归。最后求治于张志发。经过仅仅42天治疗，当她听到张志发说了一句“你现在已经基本痊愈了”，多年愁眉不展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轻松的笑容。河东沈某，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多方治疗效果不佳，后找到张志发诊治。服中药近一年痊愈，后来带领当地人致富，成为一名企业家。

苍山县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患新生儿肝炎，曾在北京某医院治疗两个多月，转氨酶仍在100单位以上。其家长慕名找到张志发求治，经两个疗程，肝功能即恢复正常。沂南铜井镇一女孩，长到十几岁了，头上却毫发不生，家长十分犯愁，孩子尤其苦恼。找到省电视台作报道求助，到市院内分泌、血液、妇科等各科检查，皆查不出原因，又找到张志发求医。张志发经仔细询问与诊断，精心为其开了处方，见其家境困难，还免除了其全部门诊挂号费。经两个月治疗，孩子头上奇迹般地生出了毛茸茸的细发，大半年后孩子头上大部分被寸余长的黑发覆盖，家人喜出望外。

多年来，张志发致力于中医内科、妇科等疾病研究，特别擅长泌尿肾病、消化、血液等疑难疾病的治疗，获得省、市科技成果10项，发表论文30余篇、著作2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认定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3年评选一次，人只带两名学生，其所带学生，本科学士3年后可直升硕士研究生，硕士3年直升博士研究生，张志发已经连续两次入选成为硕、博研究生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医术是朵花，全凭德为本；而医德之根，生于仁心。张志发有3句经常说的话：一是“当个好医生，根本与首要的是自己要有良心，对病人要有同情心”。二是“要带着感激之情下病房，想着病人开处方”。三是“当医生的思想应当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就是要心里只能装着病人，不能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复杂”，就是要更多地考虑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治病。

我深受启迪，终于悟出：张志发的“半枝莲化瘀排石汤”，就是以其良心、同情心、仁心培育提炼出来的。

### 痛砭陋习谈“五观”

国粹与国学，密不可分。在文化概念上，“国学”是华夏民族的思想“国粹”，中医之很多基础医理与观点，源于国学中的许多内核与精髓，而这些精华无疑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常青树，精神指路灯。张志发的许多人生理念信条，无不来自于国学之中。他有一句格言：“要当好医生，先要做好人。”而要当好人，必须“扶正祛邪，固本正气”。无论是做人从医，他对社会上的一些陋习时弊，都如同对待致人疾患的“六淫”外感、“七情”内伤一样，必欲针砭与祛除。与其促膝长谈中，他讲了自己的许多观点，我权且将其归纳为“五观”，确实能使人振聋发聩。

——在“中医观”上，他始终坚持必须“反玄学、念真经”，对行内一些故弄玄虚、夸大其辞的现象，他深恶痛绝。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莫说洋人，就是国人相当的也对其怀有一些神秘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业内、圈外有些人偏偏利用了中医这一特点，故弄“玄机”，故作“深奥”，说到底是功夫不到却以图功利，最终对无奈的患者及善良的人们造成误导。对此，张志发作为中医名家，绝不投鼠忌器，而是深表厌恶，痛加鞭挞。他认为，祖国医学从根本上讲是一门科学而绝非玄学，现代医学也正在不断从各方面揭示印证它的科学性。那此故弄玄虚、装模作样的，是对中医的亵渎歪曲与商品炒作，与中医的“悬壶济世观”背道而驰，大相径庭，不可轻易相信。只有念“真经”，拿出真本事，取得真实疗效，才是对祖国医学的弘扬与彰显。

——在“学术观”上，他坚定地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他信奉中医的基本医理与规臬，坚信其科学价值，坚持发挥其优势，但他绝不闭关自守，持门户之见。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医与西医，各有独到之处与优势，也各有局限与不足。二者结合，生机无限；二者分离，皆制约发展。他说，中医必须与现代医学科学相结合，必须坚持创新，才能被更多的患者所接受，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否则，只能作茧自缚。比如中医“四诊”中的“望”诊，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只凭肉眼观察形态、气色等等。X光、B超、CT检查等，在诊断疾病上更加准确，我们可以作为中医“望”诊的延伸而加以运用。早在1985年在山东中医学院理论进修时，他在学好中医的同时，就利用一切机会与时间学习西医。当时，山东医学院附院每个周二晚上举办专家讲座，为了赶路按时学习，他专门从家里运来了一辆自

行车；为了占个座位，他每天晚饭后早早直奔附院学术报告厅，学习现代医学知识。

——在“学习观”上，他对自己、对弟子们反复强调要扎扎实实，“固本强基”，坚决反对学习中医的“浮躁症”与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等风气。他说，正因为中医博大精深，就是培养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医，一般最少也需要十几年。只读了几年书本，看过一些平常之症，怎么一下就可能成为什么“一代名医”呢？这正如古人所云：“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他教导弟子们必须静心凝神，淡泊明志，潜心研读，反复实践，不断总结。这也正是古人所说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确实是医治“浮躁症”的有效方法。正因为深谙此理，他对徒弟严管而厚爱，除了言传身教，甚至连自己的一些祖传秘方都倾囊所授。他所带的徒弟，有的成为省“高层次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学科骨干”，有的被选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而他自己，则始终不渝地把“练内功”作为立医之基。虽然他少年学医，大学“科班”，但是毕业后又先后用两整年的时间，分别在市中医进修班、山东中医学院，反复重读了中医“四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等，至今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前些天，他又专门跑到北京拜师学艺。为了见到其中一位专家，他整整等了两天，以近乎于请求的真诚，终于感动了专家，同意他观摩并参与半天的门诊。他一边认真虔诚地给专家“打下手”、抄处方，一边仔细观察专家如何诊断，如何开药，聚精会神地眼观、耳听、手录、心记，潜心领会专家的每一例处置，果然收获颇丰，欢喜而归。

——在“人生观”上，他最强调自信、自强。他经常对自己的弟子说：人生当自立，自立的基石是“志向志气”“毅力耐力”。总觉得自己这不行那不中，干什么都没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必将一事无成。他的人生观教育启迪了后辈，不少弟子已经成为后起之秀，初现栋梁之用。张志发的这种人生观，正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思想。他又认为：人在事业有成之后，绝不能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也不能欲望无际、不知厌足，而是应当回归自然，实现本性。所有这些，又体现了《道德经》之“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果而勿矜、果而勿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等诸多人生哲理。

——在“价值观”上，他信奉“以德为宝，以艺立身”。他不懂趋炎附势，也不会投机钻营。当年上大学时，他只知埋头苦读，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班长见其敦厚朴实又学识优异，相当有“安全感”“可信度”，主动与他交友。班长出于“善意好心”，对他言道：就你这“土里土气”“憨拉巴几”的样子，将来怎么能找个好工作，怎么干好工作？张志发一头雾水，不解“奥秘”。但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坚信只要扎实学习，修养道德，习练本事，肯定能有好工作，能干好工作。正如老子所言：“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他什么也不理会，只是“贪婪”地学习知识，修养自身。毕业后，张志发回到了自己热爱而正贫困的沂蒙山区。由于他刻苦钻研医疗技术，努力工作，对患者具有高度的同情心与责任感，深受沂蒙人民赞誉，成为临沂电视台《琅琊风云榜》上榜人物。

## 力挽颓势开新篇

中医乃国粹，但国粹未必何时何地总是顺风顺水，也有时乖命蹇之时。改革开

放特别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现代医学的日新月异，随着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加上中医综合医院的发展与竞争等，综合性医院的中医专业面临着极大挑战，陷入尴尬困境。在这里，千年国粹能否维系，中医专业何去何从，让广大中医工作者忧心忡忡。

七年之前，市人民医院中医专业也正处于低谷，用张志发的话说，就是“专业萎缩，人才断档，岌岌可危，生死存亡”。人员上，已经13年没进过一个毕业生，还在不断向外“分流”。因为干中医“不挣钱”，不少中医大夫眼睛随时盯着外面，一有机会就准备“跳槽”。规模上，原来就不大的“门面”在继续缩小，病房床位从44张锐减到了只有22张。在林林总总、红红火火的西医专业科室中，中医科偏于一隅，默默无闻。连堂堂临沂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这样具有相当水平的中医专业科室，也处于难以维系的窘况，县区可想而知。祖国医学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上下几千年，为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健康强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中医事业的传人，对眼下的状况焦虑万分；他绝不忍心也绝不甘心让延续几千年的祖国医学之“元气”在本院丧失殆尽，也不能让国粹之“经络”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档失传”。否则，将愧对祖先，成为“不肖子孙”。力挽颓势他责无旁贷，振兴中医他首当其冲！

当时，张志发是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很长时间，他冥思苦想，对眼下中医科的“症状”进行“望闻问切”，“八纲辨证”，终于明白了症结所在：不是中医作为医学科学出了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在于方向思路。当今世界，无论成就何种事业，一靠规模实力，二要开放结合，三靠人才力量，四靠科学发展。而现在的中医科室，规模不大反而缩小，开放不足还“闭关锁国”，人才不济还分流跳槽，学科不整且无特色，何以适应竞争，图存求强？而只要变革体制机制，创新思路办法，加上我们有实力派专家，有市院这个强大平台，一定能振兴发达！他思考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目标，树立振兴中医思想，把综合医院的中医专业做大做强做好。措施，一是整合力量，建立综合医院中的中医院；二是开放结合，中医联袂，让中医走出去，把西医请进来；三是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引进培养后备力量；四是加快学科发展，突出优势，形成特色，打造品牌。

但有满腔血与情，不信东风唤不回。张志发揣着自己的方案，敲开了院长的办公室门。院长也正为中医科的发展认真思考，张志发的想法与领导可谓不谋而合，仅仅十几分钟，就得到了院长的认可，为此，医院专门召开了两次“振兴中医研讨会”，研究讨论如何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医事业。让张志发感动的是，研讨会上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无一缺席，意见高度一致，确定了“大中医”思想，成立市人民医院中医院，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开展科室全面合作，中医专业全面参与西医各专业临床诊疗，这无疑给全院中医振兴插上了新的翅膀。

七年之后，市人民医院的中医院，正如日中天，一片生机。医护人员，由原来的30多名，增加到70多名；设立了6个专业科室，开设了首席专家、知名专家冠名、专科等门诊，建立了专业研究所。来中医诊疗的患者，由原来的门可罗雀，到今天的门庭若市，比肩接踵。仅张志发自己，2011年就看了11000多例门诊。中医院成立第3年，即被国家卫生部评为“全国综合性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被省卫生厅、市卫生局先后评为省、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集体）”，来此参观考察学习交流的络绎不绝。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石学敏先生考察后十分感慨，高度评价：临沂市人民医院开创了全国综合性医院中医发展的先河！

张志发说，作为一个中医药事业的传人，培养几个学生，带几个徒弟，事业只是呈“加法”式增长。而能着眼中医的大局与未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促进中



虚心向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请教学习，并与先生合影

医药事业的整体发展与振兴，呈现的却是“几何数”增长。

短短几句话，让人们更深刻地看到了他的强烈责任心与使命感。而他，不但为中医药事业的“加法”式增长尽心尽力，更为中医药事业的“几何法”增长尽职尽责，也让我们看到了其高尚的境界与情操。

张志发，不愧沂蒙的国粹之星，祖国医学的优秀传人！

# 从“老茂”到“茂导”

——记朱时茂

本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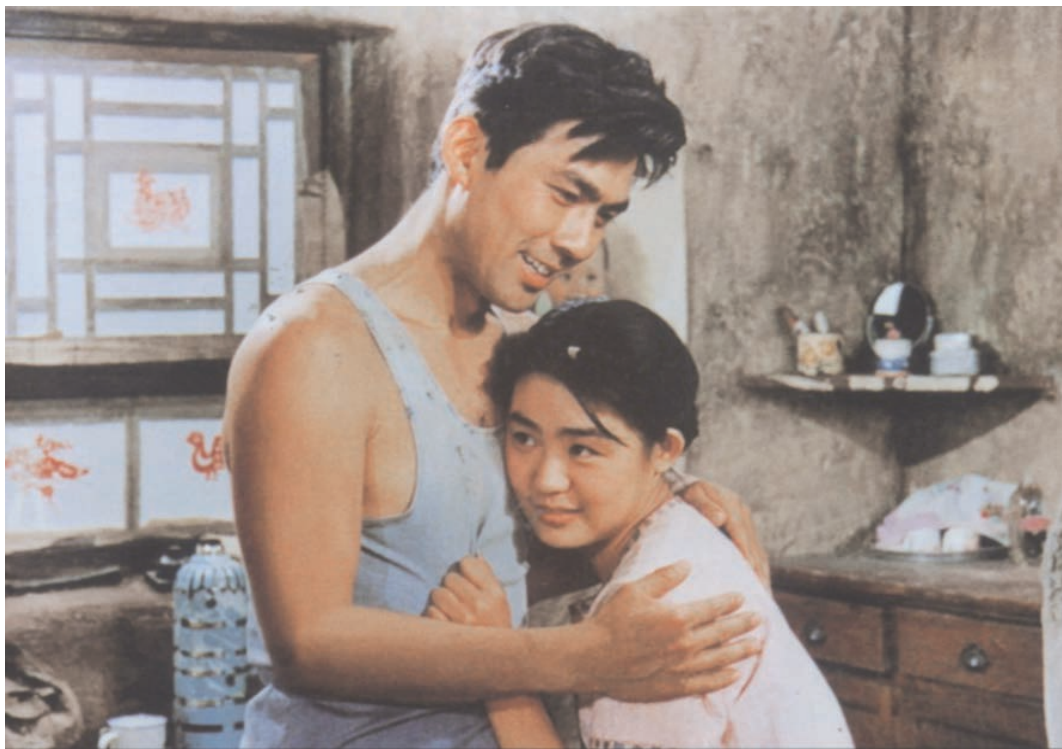


朱时茂，1954年3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沭县，著名影视演员、小品演员、导演。

197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福州军区话剧团演员。1975年参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水华导演的影片《西沙儿女》，在影片中饰演傅海龙，从此步入影坛。1983年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1982年在谢晋导演的影片《牧马人》中扮演男主角许灵筠。在导演谢晋的严格要求下，朱时茂注意把握情绪，努力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一个被打成右派受尽生活磨难而信念不倒的知识分子——许灵筠，演得活灵活现。由此，朱时茂在影坛名声大振，成为广大观众喜爱的青年演员。随后，他又在影片《柯棣华大夫》中饰演柯棣华，《道是无情胜有情》中饰演连长袁翰，《蓝鲸紧急出动》中饰演武仲毅，《我只流三次泪》中饰马川北。在近20部电影中饰演主要角色。

朱时茂还参加了许多电视剧的拍摄，如《男人的风格》《宝镜》《芦笙恋情》《长江第一漂》等。在拍摄《长江第一漂》时，为力求真实，朱时茂



电影《牧马人》剧照

亲自驾驶橡皮船，顺江而下，险些遇难。此剧拍摄十分成功，播出后，轰动一时，该剧获得“飞天”奖。

1984年春节晚会上，朱时茂与陈佩斯合作演出小品《吃面条》，由于他们二人配合默契，模仿惟妙惟肖，整场演出笑声不断，受到亿万观众的喜爱，此作品由此成为春晚舞台上的经典，从此他俩也成为小品舞台上的一对“绝配”组合。之后他们又合作了《拍电影》《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18部小品，都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人们因此送他一个绰号“老茂”。

在电影圈，朱时茂资历称得上资深，只是之后，他和陈佩斯的小品组合太过成功，观众渐渐淡忘了他曾在银幕上的角色。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年近60的朱时茂突然杀了个回马枪，重新投身电影，并非做演员，而是以导演身份出现，于是他又有了一个称呼：“茂导”。朱时茂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是《戒烟不戒酒》。那时，不少人都以为这是朱时茂为了过导演瘾的作品，等那劲过去了，他便不再提导演这事。意外的是，2013年他又带来更时尚更年轻的《爱情不NG》。谈起当导演，朱时茂说道：“我16岁开始从艺，这个年纪才来拍电影是晚了点。但第一部作品，人家很肯定，有肯定的话我就愿意做下去。”

朱时茂人称“拼命三郎”，他工作认真努力，练功刻苦，多次在练功时摔伤，一次练习空翻一周，结果多翻半圈，头朝下栽在了地上，落下了脖子总是朝一边歪的后遗症。

朱时茂为人古道热肠，是圈内公认的好人，即使后来当了导演之后也是如此，从来不会在片场对人发脾气。

2007年获中宣部、中国作协“拼搏奖”，同年，赴美国获纽约市市政厅颁发的荣誉奖；2011年获第五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盛典颁发的“十大孝子奖”。

📌 《沂蒙革命根据地志》荣获临沂市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11月16日，临沂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委员会通报了全市第二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由临沂市史志办编纂的《沂蒙革命根据地志》荣获最高奖项——“重大成果奖”，也是本次评选中唯一获此奖项的社科成果。

编纂《沂蒙革命根据地志》，是临沂市史志办依托沂蒙地区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史志成果开发利用方面做出的一次有益尝试。志书真实、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填补了沂蒙革命根据地没有志书的空白。

📌 市史志办组织收看学习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12月29日晚，临沂市史志办组织全体人员集体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关于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做出重要批示的新闻，并提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区史志办及时组织好全体人员收看。

12月30日上午，市史志办组织全办干部职工，对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入学习讨论。市史志办朱海涛主任在总结时指出：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讲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地方志工作者的关怀与期许，也为下一步贯彻落实好全国地方志《发展规划纲要》，开展好地方史志各项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对我们下一步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沂蒙抗日记忆”专题片发布。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临沂市史志办在发布“沂蒙抗日记忆”专题网页后，又联合临沂在线策划推出了“沂蒙抗日记忆”专题片。通过沂蒙老兵的口述，真实再现了抗日战

争中沂蒙儿女的精神风貌，描绘出了波澜壮阔的沂蒙抗战史。

📌 临沂市地方史志系统学习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9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迅速反应，在第一时间就学习贯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作出安排部署，对各县区史志办明确提出了学习贯彻要求。

📌 市史志办召开“严以律己”专题研讨会。9月9日，市史志办以“严以律己”为主题，召开“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会。

会议重点学习研讨如何严格遵守党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五个必须”要求，学习贯彻省、市委从严治党《决定》和“两个意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史志办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结合自身分管工作和思想实际，作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发言。

📌 市史志办召开“严以用权”专题研讨会。10月29日上午，市史志办召开“三严三实”严以用权专题研讨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6名科级干部围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结合本职工作，作了“严以用权，把敢于担当内化为谋事创业做人的实际行动”交流发言。

📌 《兰陵县抗战大事记》出版发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展现兰陵县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由兰陵县史志办组织编写的《兰陵县抗战大事记》近日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

兰陵地区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对敌斗争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事件，讴歌了全县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业绩。

📌 《临沭大事记》出版发行。近日，《临沭大事记》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临沭大事记》由临沭县史志办公室编纂，上限起于“临沭”县名第一次见之史书的公元621年，下截止于公元2014年，采用编年体和记事相结合的体例，以事件发生顺序为线索编写，主要记述了临沭县境发生的大事、要事，是一部临沭地方简史。

📌 《费县志（1986—2010）》出版发行。《费县志（1986—2010）》，分上、中、下3卷，32编，近300万字，随文图片1200多幅，历时3年编纂完成，是目前全市县区志中资料最完整、内容最厚实、卷数最多、插图最丰富的地方综合志书。

📌 《蒙阴年鉴（2009—2013）》出版发行。《蒙阴年鉴（2009—2013）》设21个栏目，共131万字，翔实、系统地记述了全县各项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进展、新变化，着力突出了蒙阴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亮点与特色。

📌 《沂水年鉴2014》出版发行。近日，《沂水年鉴2014》由中国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年鉴设转载、专记、大事记、概况、附录等24个篇目，共81万字。该年鉴全面、系统地记述了2014年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 临沭县陈巡会陈氏族谱出版。族谱设字辈、族规、家训、陈氏源流及开支、陈姓郡望与堂号解析、族史沿革、世系表、支谱等，对陈巡会陈氏的渊源、历史沿革以及各分支予以详细的记述，填补了临沭县谱牒空白。